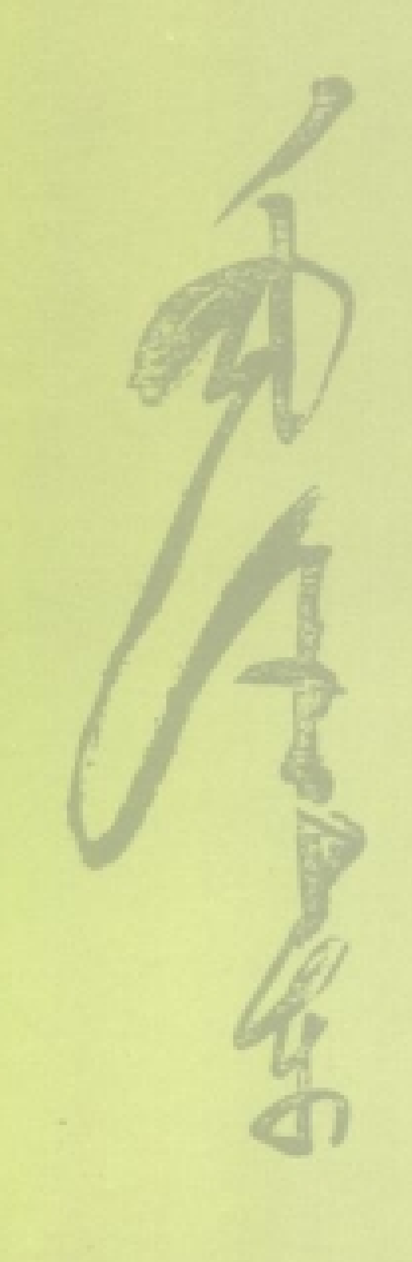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二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中央文献出版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JIANGUO YILAI MAOZEDONG WENGAO

第十二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1740信箱

北京运乔宏源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 20.375印张 390,000字 00,001-10,000册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73-0398-5/A·64 内部发行 定价38.00元

出版说明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一部供研究用的多卷本文献集，编入毛泽东建国后的以下三类文稿：（一）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讲话提纲、批注、书信、诗词、在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等）；（二）经他审定过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三）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的其他文稿。这些文稿，少量曾公开发表，比较多的在党内或大或小范围印发过，还有一部分未曾印发过。其中包含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也包含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判断和观点。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

这部文献集，按时间顺序编辑，分册出版。

编入这部文献集的文稿，已经公开发表的，按发表稿排印；没有公开发表的，按手稿或其他原件排印。每篇文稿末尾，均有所据稿本或版本的刊印说明，有的还有不同版本变动情况和选用情况的说明。文稿中的错字、漏字，分别在〈　〉号和〔　〕号内校正，衍字加□号。原稿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原稿没有标点的，由编者加了标点。文稿中史实不准确的，加注释说明。原来没有标题的文稿由编者拟了标题。为方便

读者，将编者认为内容较重要的文稿的标题，在目录中用黑体字排印。

注释详略不一，根据理解正文的需要而定，排在每篇文稿后面。

这部文献集，由于部分文稿具有一定的机密性，只发行到地师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高级专业人员。请妥善保管，不得外传和翻印。除公开发表过的文稿外，非经征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不得引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一九九〇年四月

目　　录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阿尔巴尼亚解放日之后，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生活中又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二十年来，勤劳勇

敢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阿尔巴尼亚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今年开始的第四个五年计划而努力。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深信，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上，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威望越来越高。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世界人民革命的事业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一向紧密合作，互相支持，结成了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我们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友谊和团结，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并将放射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

根据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给章士钊[1]的信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行严先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2〕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3〕，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顺颂

春安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4〕一件，均附上。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 《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写的一部纪传体魏、蜀、吴三国史，分魏志、蜀志、吴志，共六十五卷。三志原本各自独立，后世将它合为一书。

〔3〕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曾将这部书稿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阅读。十二月五日，康生给毛泽东写

信说，“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评价，见本书第十一册第430页《给康生的信》）。“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须要作词句的删改”。《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在一九七一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4〕 指康生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给毛泽东的信。

给周世钊[1]的信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东园兄：

数接惠书及所附大作诗词数十首，均已收读，极为高兴。因忙，主要因懒，未及早复，抱歉之至。看来你的兴趣尚浓，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谨复，顺颂安吉！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周世钊，字惇元，又名东园，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对有关《海瑞罢官》[1]问题七个材料[2]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

江青：

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毛　泽　东

二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创作的新编历史剧，一九六〇年底完成，一九六一年初开始上演。一九六五年初，江青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发展为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政治批判运动，这一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吴晗这一冤案平反。

〔2〕这七个材料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一九六六年一月分几次报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二月一日，彭真转报毛泽东等。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这七个材料的目录页上。七个材料分别是：一、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

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二、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三、汇报关锋等人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四、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五、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六、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七、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关于重新印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十二日）

一

彭真同志：

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2]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3]是好的。

毛　泽　东

1966年二月六日

二

彭真同志：

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毛　泽　东

二月十二日二时四十分

根据手稿刊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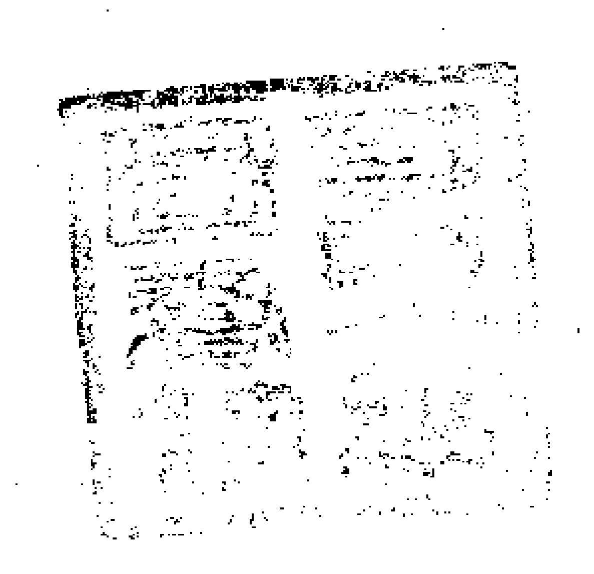
注　释

〔1〕　七千人大会，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各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曾作为中发［62］147号绝密文件印发。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读了一遍。我认为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有迫切的意义。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引导这个高潮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本篇一就写在王任重的来信上。本篇二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报送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彭真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大家（任重同志参加）讨论了两次，提了些小的修改意见，供参考。请核定。"这个讲话，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发至县团级党委，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

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3〕 王任重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对毛泽东的讲话稿提出了六条纯属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彭真二月十一日送审的这一讲话修改稿中，采纳了王任重的修改意见。



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任重〔1〕同志：

此件〔2〕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3〕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中共湖北省委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其中指出，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就会出现

革命性的飞跃，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才能获得解决。而农业的大发展，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巩固的基础，它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对于备战、建设、防修，都关系极大，因而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我省，实现农业机械化，要走孝感县金星大队的道路，也就是大寨的道路，即是在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用本省生产的农业机械，来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要发扬大寨精神，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保证增产和增加社员收入的原则下，采取以集体办机械为主、国家扶助为辅，“以机养机”、分期购进，国家扶助、无息贷款等办法，逐步实现机械化。要做好这一工作，关键在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今年一定要办好十七个公社的试点工作，并作出全面规划。规划不光是指标要求，而且是组织一个革命飞跃的行动纲要。从今年算起，我们要力争在五年、七年、十年内（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实现农业机械化。

〔3〕 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给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信说：“我赞成将湖北省委这个文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主席批语也一并转发。此外，中央还可加一个批语。”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的文件、毛泽东的批语和刘少奇的信，并加了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批语。中央的批语指出：“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了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是要在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他最近又提出各省、市、自治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农业机械化计划，争取从今年起，用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这个任务是同他指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紧紧联系着的。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

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局部地区的灾荒无论哪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毛泽东同志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动员广大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非常适时，非常重要。机不可失，我们应当立即抓紧这项工作。”“中央认为，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具体步骤，应当由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直接负责，特别是省一级要有必要的主动权。湖北现场会议以后，各地党委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农业机械化计划的初步草案，内容包括分批分期、分别轻重先后缓急、由点到面、由低到高、土洋并举等措施，并同国家统一计划相结合。这种计划草案经过酝酿，然后提交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给罗丽华[1]的题词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要注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分析自己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1966年2月24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罗丽华，当时是人民大会堂服务员。

对王任重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发言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月）

一

少奇[2]同志：

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

毛　泽　东

二月廿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同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

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工厂可以把奖金加到工资里去，只要不超过工资总基金就可以。原则有两条，一条是不增加国家开支，另一条是工人的实际收入不减少。以后只搞精神鼓励，不搞物质刺激。农村的基本办法是搞底分制，按人评底分，反对搞烦琐哲学，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搞政治挂帅，要有一系列的措施跟上去，否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本篇一写在王任重这一发言的铅印稿上。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加批语转发了王任重的发言稿，指出："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牵涉的方面和问题很多，需要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全面考虑，通过群众路线，逐步解决。请中央有关各部委和各省市区党委找几个工厂、商店、生产队等单位，选择条件比较成熟的问题，在今年试点，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全面解决这个问题。"本篇二就写在中共中央这个批语稿上。

〔2〕 少奇，即刘少奇。

同毛远新[1]谈教学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1〕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曾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和教员。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1]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少奇同志：

三月十一日信[2]收到。小计委[3]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

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4〕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七十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5〕

毛　泽　东

三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载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注　释

〔1〕　在这封信的打印稿上，毛泽东曾经批示“未发，拟不发，待讨论”。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在转发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指示中，转述了毛泽东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参见本册第13页注〔3〕。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毛泽东诞辰八十四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封信，题为《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并删去了信的上下款。

〔2〕　指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文件和主席批语（见本册第12—13页）已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并发给包括计委、经委在内的各有关部委及华北局有关同志研究，准备意见。原拟过几天中央开一次会讨论后，将湖北省委文件转发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后来在有各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对有关各方面情况先摸一摸，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并要提交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加以讨论，以使各地方的努力更加符合实际。恩来同志已要小计委派人到湖

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因此湖北省委这个文件暂缓转发各地。

〔3〕 小计委，是一九六五年初毛泽东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成员有当时的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李人俊，浙江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林乎加及北京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贾庭三等。后来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由小计委的同志正式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不再用小计委的名称。

〔4〕 余秋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林乎加，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5〕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为转发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等文件加写的批语中指出，为了推动农业机械化工作和交流经验，“中央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商定，于今年四月下旬或五月初在湖北召开现场会议，除各中央局派人参加外，每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参加会议的同志是管农业的书记一人，计委一人，或者再去一位主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同志，西藏去一人即可。会前，中央将派小计委的同志到湖北先进行调查研究，同湖北省委一道，着手现场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的具体时间，届时另行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可先派一二人到湖北参观，同时各地可以总结本地区若干单位农业机械化的典型经验和一般农机具的生产、供应、修配、管理情况，带到现场会议上交流经验”。

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

一

江青：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　泽　东

三月十七日

二

江青：

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

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

毛　泽　东

三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已阅，同意。

退彭真同志。

四

此件〔2〕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

五

去掉一句。〔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六

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4〕

七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八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5〕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九

这样较妥。〔6〕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十

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7〕

十一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8〕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十二

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十三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十四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

十五

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十六

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

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

十七

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十八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根据毛泽东手搞刊印。

注　释

〔1〕　这篇纪要原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审阅后写给江青的两个批语；本篇三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送审的中央转发这一纪要的指示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五、九是写在纪要上的两个批注；本篇四、八、十二、十八是在纪要中加写的话；本篇六、七、十、十一、十三至十七是对纪要的修改，其

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对这个纪要，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修改，主要有：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为“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删去“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解放军是主席亲手缔造的”等语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纪要。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撤销了这个纪要，并对因纪要影响而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予以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2〕 指纪要中提到的《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这篇谈话经过整理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后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3〕 纪要中讲到江青这次“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一句，并写了这个批注。

〔4〕 四篇著作，指纪要中提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一句，原为“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

〔5〕 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6〕 纪要中讲到近三年来出现了许多“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

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毛泽东审阅时，将引号内的文字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并写了这个批注。

〔7〕 这句话原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8〕 王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领导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1〕

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在上海市西郊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说的一句话。在这次谈话中他讲到：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其中的“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后作为“毛主席语录”，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对中共代表团与日共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中一段文字的修改[1]

（一九六六年三月）

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2〕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正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以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于一九六六年二月至四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并由双方代表团起草小

组起草了联合公报草案。本篇是毛泽东对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送审的公报草案中一段文字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对这个公报草案，毛泽东还有一些其他文字和内容上的修改。后来这个公报草案未能达成协议。

〔2〕 一九五七年宣言，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一九六〇年声明，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

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2〕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3〕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毛　泽　东

四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上。这期摘要登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抽调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分别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试行在工厂办学、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公社试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的批语当时没有印发。

〔2〕 “四清”运动，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 这是晚唐诗人章碣写的七绝《焚书坑》。原诗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对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词中一段话的批注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这一段话[1]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1966年四月十四日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的以下一段话："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毛泽东关于机要保密工作的一些指示辑印在一起，准备发给参加全国机要保密会议的人员学习。毛泽东审阅时，在这段话后面，加括号写了这个批注。

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1]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2]

（一九六六年四月）

一

江青：

送上北京来件[3]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毛 泽 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半

二

恩来、小平[4]、彭真同志：

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

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

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

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三

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5]

毛　泽　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

根据手稿刊印。

四

已阅。

退康生办。[6]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五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7〕，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六

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8〕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七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

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八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九

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十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来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

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一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

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9〕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根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一九六四年七月设立的，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五人组成。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后整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2〕 这个通知稿即后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本篇五至十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稿），由周恩来等于一九六六

年四月十二日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4〕 恩来，即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5〕 这个批语写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上。对这个通知稿，毛泽东后来又作过多次修改，见本篇五至十一。

〔6〕 这是对康生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报送的通知修改稿的批语。康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通知》第四页第七条末句，按主席指示，作了修改，请审阅。"第七条末句，最后改定为本篇九中用宋体字排印的部分。

〔7〕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重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这个名单，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多次变动。

〔8〕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一九六九年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三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

〔9〕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此件〔1〕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简报说，高教部党委于四月十七日召开北京、天津十所高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和部署了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问题。会上，北大等学校汇报了前一时期学术批判情况，提出目前在批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从学术观点上批判得多，从政治观点上批判得少，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会上对今后深入开展这一运动作了如下部署：（1）各院校领导必须明确，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教育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是教育战线彻底清除资产阶级专家垄断教育的斗争，是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2）目前高校的所有工

作都要和当前学术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学术批判来推动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3) 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师生和教职员工积极参加这场战斗。

对《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中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修改和批语[1]

(一九六六年四月)

一

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央红军由福建汀州（长汀）进军江西。七月，又从江西向湖南进军，准备第二次攻取长沙，结果未能攻入。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条件下，敌人已有准备，进攻长沙是不正确的。但当时由于蒋、冯、阎在河南大混战〔2〕，南方湘赣诸省在半年之内，除长沙、南昌诸城之外，其余地方都无强敌。所以红军乘此机会，攻取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第一次敌人的“围剿”准备了条件。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说服，中央红军的干部终于改变作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峡江、新喻等地，使红军力量和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首词是写红军在进军中的豪情壮志的。〔3〕

根据毛泽东修改刊印。

二

可以。

三

已阅。

退乔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在主席诗词注释本中，有两三处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请示。（一）对《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根据总政几位同志的建议，参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注释，作了一个题注，不知是否适当？请批示。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个题注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二）《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据袁水拍同志告主席意见，仍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三）《七律·送瘟神》一诗中的“千村薜苈人遗矢”，据读者来信和查阅有关典籍，拟改作“千村薜荔人遗矢”。以上两处正文的更动，未知可否？请一并指示。在这两条后面，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本篇三写在胡乔木给毛泽东请示信的信封上。

〔2〕 蒋，指蒋介石。冯，指冯玉祥。阎，指阎锡山。一九三〇年三、四月间，阎锡山、冯玉祥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副总司令名义，通电反蒋，引发了一场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大规模混战，史称“中原大战”。

〔3〕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中，对这条题注稿作了修订。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又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现在的文字是：“一九三〇年六月，红军第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由福建省汀州（长汀）进军江西省。八月，从江西向湖南进军，在浏阳东北同彭德怀领导的红军第三军团会合，并决定共同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九月，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未克。守敌强而有备，红军不宜攻坚。同年夏由于蒋、冯（玉祥）、阎（锡山）正在河南等地混战，数月之内江西、湖南一带，除长沙、南昌等大中城市外，都无强敌。因此，毛泽东说服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改变当时立三路线的党中央指示的夺取湘鄂赣三省省会的冒险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峡江、新喻（今新余）等地，占领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准备了条件。这首词写的是红军六月、七月进军中的豪迈心情。”

对林一山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工程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四月）

已阅。

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一九六六年三月九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报告说，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进行工作。三峡水利资源综合利用效益极大，但要积极开发，就必须解决建设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也是有人反对近期建设三峡的一项重要根据。最近几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着重研究了建筑物防护、水库淤积和分期建设等三个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分期建设更符合于“有利无弊”的方针，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设三峡工程的可能性。三峡水利枢纽的规划设计原则是：综合利用，合理安排防洪、发电、航运，充分利用水利资源，除害兴利，在其他防洪工程配合下，逐步达到根治长江的目的。在实现各项水利目标的程序上，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实现。分期建设可以用较少的投资额、较短的工期，尽早地发挥效益，有利

于国家资金的合理使用，同时也有利于工程防护。报告在对三峡工程的防淤、防空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证后提出，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建议中央将这一工程列为第三、四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四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将林一山的这个报告及其他两份相关的报告一起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王任重的送审报告上。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十四日）

一

林彪[1]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2]，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3]；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

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已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有手稿）

二

林彪同志：

此件〔4〕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5〕，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要请中央加个批语〔6〕。请你酌办。

毛　泽　东

五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3〕　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

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4〕 即本篇一。因写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后来通称为《五·七指示》。

〔5〕 指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6〕 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转发了毛泽东的批语和军委总后勤部的报告，并加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印发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意见[1]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

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2]

毛　泽　东

五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张恩慈（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写的《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这个材料对北大“四清”工作队、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对北大“四清”运动的领导，以及北大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尖锐的看法。毛泽东批示印发时，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

〔2〕　少奇，即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他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这次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

对章士钊关于暂不出版《柳文指要》来信[1]的批语和批注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一

刘、周、邓[2]阅。送康生[3]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不可能这样快。[4]

三

此语说得过分。[5]

四

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6〕

五

何至如此。〔7〕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柳文指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一九六五年，章士钊将这部书稿送毛泽东审阅。同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复信提出意见（见本书第十一册第404页），并于八月五日将书稿批给康生阅读。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将书稿连同康生的意见和来信一并退给章士钊（见本册第4页）。五月十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暂不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一九七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2〕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 这个批注写在章士钊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一句话旁。

〔5〕 章士钊的信中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在其中的后半句话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6〕 章士钊的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7〕 章士钊的信中说，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毛泽东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关于同意派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日）

同意这样做。

毛　泽　东

五月卅日廿三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写信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五月三十一日即进报社工作。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信末还附有临时工作组在京人员名单。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康生、伯达[2]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　泽　东

六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上。该期简报登载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新华社六月一日全文播发，《人民日报》等报刊六月二日刊载。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

委书记。彭佩云，当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此后不久，他们均被错误地撤销领导职务。聂元梓，当时任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后因反革命罪于一九七八年被依法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关于暂不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

少奇、小平〔1〕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2〕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3〕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4〕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5〕，扩成为廿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廿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6〕，值得参考。

毛　泽　东

六月卅日二时

根据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后来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3〕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4〕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5〕　中共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草案，最初为十二条，曾一度扩展为二十三条，最后确定为十六条，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6〕　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中说，六月三日至六日，华东局召开书记处会议，传达和讨论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关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在运动中，要进一步组织工农兵和干部大学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会议研究了以下政策和部署：一、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二、坚定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对于只有个别缺点的左派，应加以保护，不要混淆斗争目标。要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或写过一些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要注意把资产阶级“学阀”、“权威”，同有一

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右派，要抓要害，抓要害的单位、要害的人物，特别是要首先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报上点名公开批判要慎重，要准确。干部的撤职免职以及在报上公开批判的，均应按照干部管理的范围，由上级批准。三、重新组织革命的文化队伍。四、“四清”运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五、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各级党委的领导，应当采取重点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对各单位的运动，派不派工作组，什么时候派工作组，应当根据情况的发展需要来考虑。报告最后指出，当前各级党委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文化大革命，全面安排工业、农业、财贸、小三线建设等项工作。

七　律

有　所　思

（一九六六年六月）

正是神都有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

（一九六六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1〕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九期刊印。

注释

〔1〕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的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中，在“毛主席教导我们”后面引用了这句话。《人民日报》七月三日转载了这篇社论。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交企业和基建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

少奇、小平〔1〕同志：

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2〕，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毛　泽　东

七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给毛泽东的信和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好，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

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完不成。在京同志讨论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刘少奇、邓小平送审的通知草稿指出，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各地原来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抓革命、保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

给江青[1]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江青：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2]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3]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4]，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5]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6]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7]，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8]，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

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9〕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10〕，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11〕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

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12〕，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13〕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

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　泽　东

1966年7月8日

根据修改件刊印。其中的有些段落曾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

注　释

〔1〕　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　魏，指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指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　指上海市。

〔4〕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七月十七日，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5〕　指杭州市。

〔6〕　指毛泽东家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7〕　指武汉市。

〔8〕　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讲话。

〔9〕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中这几句话为："'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10〕　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1〕　指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2〕 一九七二年五月，毛泽东的这封信曾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五印发。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和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13〕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周围的大小岛屿。

对陶铸、张平化关于中宣部的组织和工作问题请示信[1]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

陶铸同志：

同意你们的意见。请中央常委最后决定。

毛　泽　东

七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和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平化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给中央和毛泽东的这封请示信的主要内容是：一、彻底改组部的领导。二、新的工作方针。今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三、目前工作的抓法。计划在七、八两月，组织对处长以上重点对象的批判，并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揭露问题，结合扩大队伍，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同时，抽出一部分力量，抓在九月召开的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一些日常工作。

对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

伯达、康生〔1〕酌处。

此件〔2〕已阅，请你们看一下。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

毛　泽　东

七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会议文件刊印。

注　释

〔1〕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　指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以前高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就会逐步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彻底的改革：1、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2、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3、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4、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5、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这封信和毛泽东的批语，曾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三印发。

畅游长江时的谈话[1]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

一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二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根据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第五次畅游长江。本篇一、二是他在畅游长江时的谈话，摘自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新闻稿《毛主席畅游长江》。

对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月）

一

伯达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工作组开一二次会，然后经政治局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三天会，讨论通过，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以在八月一日发表为好。后两叶有点修改[2]。

毛　泽　东

七月廿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七月二十六日修正稿[3]。

供讨论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伯达同志：

改得很好，可即印发。〔4〕

毛　泽　东

八月三日下午九时

四

伯达同志：

《决定》中"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请酌定。〔5〕

毛　泽　东

八月七日下午二时

五

即送伯达同志：

同意修改之处。在第10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定。〔6〕

毛　泽　东

八月七日下午十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月间曾作过多次批语和修改。本篇一是写在七月十六日草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七月二十六日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三是写在陈伯达八月三日晚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四、五是对陈伯达八月七日送审稿的批语。这一决定的七月十六日草稿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内容共二十三条。后来几经修改，在七月二十九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时，改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内容压缩为十六条。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八月九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决定中有几段话收入了经毛泽东审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这几段话是："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此外，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在"毛主席指出"后面，登载了决定中的以下一段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2〕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印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草稿),共十九页。在第十八页,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一句,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在第十九页,将"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一句,改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伟大的胜利。"

〔3〕 指陈伯达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晨报送的决定修改稿。毛泽东在这次修改稿第七页"各单位党的领导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各种意见"和"党的领导要同群众一起"两句中的"党的领导"后面,分别加上了"和革命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十一个字。此外,在其他地方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4〕 这是对陈伯达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送审的决定修正稿的批语。陈伯达在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中说:"今日上午,康生、陶铸、王任重、张春桥等同志和我,考虑小组会上的意见,对这个稿子,又作了些修改。请审阅批示!"

〔5〕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晚十一时批示印发的决定修正稿第二页上,将"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无名小卒成了勇敢的闯将"一句中的"无名小卒",改为"无名青少年"。

〔6〕 陈伯达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送审的决定修正稿第十页写道:"对一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

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划这样一条大杠杠，是必要的。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改造。"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划这样一条大杠杠，是必要的"一句，并将"对一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改为"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将"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改造"改为"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词语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八月四日）

一

陶铸〔1〕同志阅后，退张平化〔2〕同志：

此件〔3〕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　泽　东

七月廿五日

二

可发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掌握。〔4〕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2〕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3〕 指题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会议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将此稿第五页“他竭力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指示”一句中的“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这篇电讯稿发表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周扬，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地指控为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十七年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等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予以彻底平反。

〔4〕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的指示，作了讨论。大家建议采取如下步骤：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在群众稿件中有这类语言的，还应当保留一个时期。二、外国朋友赞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应按照他们的原话报道，不要用推论的方法去“加码”。有些不符合主席此次指示精神的话，仍可报道，但不要用在标题上。三、“反党黑帮”必然会利用我们改变提法的机会向党反攻，从根本上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揭露他们的阴谋。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中央指示。如认为可行，目前应传达到什么范围，亦请中央考虑决定。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将陶铸的报告发至省军级。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

一

各同志〔1〕：

请考虑此件〔2〕及附件〔3〕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

毛　泽　东

七月卅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

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根据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指刘少奇，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组员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等十五人。

〔2〕　即本篇二。这封信没有发出。

〔3〕　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写的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写的大字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七月二十八日，他们将这两张大字报送江青审阅，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这两张大字报后来载于一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题目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人民日报》八月二十四日予以转载。

炮打司令部[1]
——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2]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3]，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4]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载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

注　释

〔1〕　毛泽东这张大字报中所说的“司令部”，实际上是指“文

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性的所谓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中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白色恐怖”，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这件事，后来被错误地指责为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向中央报送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于十月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这次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刘少奇在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根据复查结果，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

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议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过去对于刘少奇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2〕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3〕 指《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发表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4〕 本篇原写在一份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上。这一天的《北京日报》转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毛泽东后来作过两次修改，并加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炮打司令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县团级，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的批注[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1966年8月5日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是《人民日报》为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而写的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此文时，毛泽东在其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面，加括号写了这个批注。这篇文章及毛泽东的批注后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县团级。

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九日、十一日）

一

康生同志：

改得好。我只在第五页上去掉一句〔2〕。

毛　泽　东

八月五日

二

康生同志：

有些修改〔3〕，请酌定。其他都同意。

毛　泽　东

八月九日下午

三

康生同志：

可照此印发。

毛　泽　东

八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四

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五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

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六

我们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送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上；本篇二写在康生八月九日送审稿上；本篇三写在康生八月十一日送审稿上；本篇四是在八月九日送审稿中加写的一段话；本篇五是对八月九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六是对八月五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五、六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于八月十二日经全会通过，发表在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2〕　毛泽东在康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送审的公报稿第五页去掉的一句话是"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

明”。其中所说的声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有关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援越抗美的声明。

〔3〕 毛泽东对康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送审的公报稿的修改，除本篇四、五外，还将“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划时代的新发展”一句中的“划时代的新发展”，改为“一个发展”。

对李达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毛泽东

八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 李达，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大学校长。当时被错误地打成所谓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头目”，戴上“叛徒”、“地主分子”的帽子，并被开除党籍。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解救他。毛泽东见信后即写了这个批语。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接到毛泽东的批语后，立即批示：“即送任重同志。”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八月二十四日，李达受迫害致死。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在中央接待站会见首都群众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

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十一日电讯稿报道，毛泽东于十日下午七时十五分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前来庆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首都群众，向大家说了这句话。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1〕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2〕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3〕，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文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

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2〕 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3〕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和批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国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和通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中央领导机构。

对陈伯达、康生[1]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北京市委书记请示报告[2]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

林、周、陶、刘、邓[3]、雪峰同志阅，请林主持开会谈一下。雪峰市委暂时似可名义上不动，实际工作交与吴德[4]主持，需要华北局支持时去支持一下，似较好，请酌。

毛 泽 东

八月十五日廿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 陈伯达、康生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我们请主席考虑，雪峰同志是否可以集中力量管华北局，不必再兼北京市书记，市委书记可由吴德同志接任。"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3〕 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陶，指陶铸。刘，指刘少

奇。邓，指邓小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他们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4〕 吴德，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市长。

给刘少奇[1]的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

少奇同志：

给续范亭信[2]及我在信上建议改写的话，印象都不深了，如找到，请再给一阅，阅后送还，可否请酌。

毛　泽　东

八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刘少奇，参见本册第90页注〔1〕。

〔2〕　指刘少奇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的信。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提法批注了自己的意见，并于当年十二月十七日给刘少奇写信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刘少奇将他给续范亭的信及毛泽东的批注一起送毛泽东。

对林彪[1]三篇讲话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

林彪同志：

这三件[2]都看了，都赞成。

毛　泽　东

八月十六日下午七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指林彪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稿、八月十二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和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

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同林彪的谈话[1]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首都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本篇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庆祝游行队伍时同林彪的谈话。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革命要靠自己

（一九六六年）

革命要靠自己。〔1〕

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这是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讲话中引用的毛泽东的话。周恩来的讲话发表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对薄一波[1]来信的批语[2]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印发常委、文革小组及薄一波同志。

请一波同志将一个请求和一个设想，先用书面告我，然后谈话，可以缩短谈的时间。你是一个爱讲长话的人，我有点害怕听三四小时那样的长话。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一日夜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他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使他得到了平反昭雪。

〔2〕　这个批语写在薄一波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上主席跟我握手并亲切勉励要我好好革命时，我深受感动。”“最近主席如果有时间，希望找我谈一次。我想主要谈两个问题：(一)工交各部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情况；同时检查我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及我的一个请求。(二)我对改革工业体制的一个设想。”

对谢富治关于公安部机关精简设想[1]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研究。我看这个设想是好的，应在下一次会议上谈一下。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就公安部机关的精简问题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今年四月主席在杭州关于公安部应砍掉三分之二的指示精神，我们在五月间发动处以上干部就精简问题进行了鸣放辩论。经过几个月的酝酿，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解决精简问题已完全成熟了。目前公安部有行政编制一千四百多人，机构庞大。根据公安工作主要是依靠党、依靠群众的根本路线和上虚下实的原则，我们设想，把现在的十二个局合并为六个，九十个处合并为三十多个，行政编制由一千四百多人减到四百多人。企、事业单位现有七千多人，分别交给有关单位。我们还设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彻底革命，力争把行政编制减到二三百人。

关于传阅文件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陶铸〔1〕同志：

传阅文件，应注明退何人存档。

毛　泽　东

八月廿六日下午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在李富春关于国务院八个口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报告[1]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

毛　泽　东

八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写报告，汇报了国务院八个口（外事、文教、科学三口除外）机关两个多月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对这些单位如何贯彻“十六条”，搞好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了十条意见。在八月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此发表意见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

对关锋、戚本禹反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此件〔1〕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2〕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关锋、戚本禹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给副组长江青的报告。报告中说，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八月十八日百万人大会后有了很大发展，各大、中学普遍建立了组织。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的活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积极出来领导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破坏文化大革命；（二）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报告提出了新北京市委应站到运动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

工作组的路线应进行批判等四点建议。八月二十七日，江青将这个报告转送毛泽东。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这个报告上。

〔2〕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陶鲁笳，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

（一九六六年八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根据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这是《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引用的毛泽东的两句话。此前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过：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在章士钊反映被抄家情况来信上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送总理酌处〔2〕。应当予以保护。

毛 泽 东

八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八月二十九日晚被抄家的情况，请求毛泽东帮助，“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最要紧在不发生重复搜索”。毛泽东阅信后即在上面写了这个批语。据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写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记载，九月一日，毛泽东还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2〕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信件和批语后，当即办理，并于八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在信封上批注：“已办。周注”。同时，他还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

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

对林彪[1]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2]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退林彪同志：

这样修改[3]很好。

毛　泽　东

八月卅一日上午十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北京及全国各地的五十万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分别发表讲话。本篇是毛泽东对林彪八月三十一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

〔3〕 指林彪在送审的讲话稿中加写的两句话，即在讲话稿中“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面，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通知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退总理。此件不发。

毛　泽　东

九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送审的通知稿上。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一、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通知稿中把这些部门和单位分为十六类，一一列出。二、对上述部门和单位，如发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坏，必须依法处理。三、重要档案应加以封存。四、此通知发至县团级，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布。

对傅连暲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

送陶铸同志酌处[2]。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毛　泽　东

九月三日

二

傅医生：

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八日

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

毛泽东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对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来信的批语。傅连暲在信中向毛泽东反映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帽子，请求给予保护。本篇二是对傅连暲十二月十二日来信的批语。傅连暲在这封信中讲到自从对他进行斗争以来，所有的政治待遇（包括全国政协常委的待遇）都被取消，文件不能看，报告不能听。

〔2〕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他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即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按主席批示，对傅加以保护。”

对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告西北局的两份电报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照发。

毛　泽　东

九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对周恩来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送审的三份文件的批语。三份文件中有两件是中共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西北局的电报，当日分别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一九六六年第四五一、四五二号下发。这两件电报分别指出："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采取保护方针。王恩茂同志正确执行了中央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北京学生们解释新疆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地区，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维汉民族的团结，防止苏修和少数民族主义者的挑拨利用。""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

众要求，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掌握。”赛福鼎，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王恩茂，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2]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3]，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4]，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5]，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6]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的报告上。报告中说：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游泳中去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报告认为学生批判的方向是对的，“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批判对象，“这是方向的错误”。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3〕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语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决定。

〔4〕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5〕 郭影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6〕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对四位美国专家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1〕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2〕，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总理，指周恩来。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2〕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调查组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抄录的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我们坚决反对政治、生活上的特殊待遇，坚决要求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

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容许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要求：1. 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 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 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 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5. 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 我们的孩子和中国人的孩子受到同样待遇和严格要求。7. 生活待遇和同级工作人员一样。8. 取消特殊化。

关于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退陈毅〔1〕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2〕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

〔2〕 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登载的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信中除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行为表示赞赏外，还对中国派驻维也纳使馆有关人员的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希望“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与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九月八日印发的《一坦桑尼

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批评我驻坦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第九号简报上。

对中央关于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稿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

一

陶铸[1]同志：

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谁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请再议削，印出交来。[2]

毛　泽　东

九月十日

二

陶铸同志：

省得多了，不知送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如未，请送他们议一下。[3]

毛　泽　东

九月十二日

三

林彪〔4〕同志阅后退陶铸同志照办。

毛　泽　东

九月十四日下午

凡事要思索，不宜仓猝作出决定。凡大事要征求较多同志的意见。请陶、周、任重〔5〕注意。标语、口号由100条改为23条，较好，是一教训。毛又及〔6〕

根据手稿刊印。

四

同意。〔7〕

五

同意。〔8〕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

〔2〕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标语、口号的通知稿上。通知稿除提出国庆节挂像、抬像的三条规定外，还列举了标语六十

条、口号四十条，共一百条。毛泽东在审阅时，对标语作了大量的删减。

〔3〕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修改后的标语与口号合在一起，共三十条。

〔4〕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5〕 陶，指陶铸。周，指周恩来。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

〔6〕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陶铸在送审报告中写道："遵示送文革小组讨论，又修改了一次，特再送陈审阅。"这次修改稿的标题改为《关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其中口号被压缩为二十三条。

〔7〕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晨二时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这次送审稿对二十三条口号又作了个别内容上的修改。

〔8〕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这次送审稿上加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两条口号，最后定稿为二十五条。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将这一通知下发到县团级。

关于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一事给林彪[1]等的信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

林彪、总理、陶铸〔2〕同志：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3〕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十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总理，指周恩来。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3〕 据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十五日电讯稿报道，毛泽东于十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及首都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对刘少奇[1]《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2]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3〕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 刘少奇，参见本册第90页注〔1〕。

〔2〕 这个检讨提纲修改后，改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3〕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对林彪[1]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2]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一

很好。改了一点，请林酌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

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根据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首都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分别发表讲话。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九月十五日晨送审的林彪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这个讲话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对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一

同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可以由两个人讲。

毛　泽　东

十五日上午十点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晨二时送审的周恩来讲话稿的批语。周恩来九月十四日将这份讲话稿送陶铸时提出："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讲即可，已函请主席批示。"陶铸在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我意明天还是由林总与总理两个都讲较好。请主席批示。"本篇二

即是对此事而写的。九月十五日下午，周恩来根据这个讲稿在接见大会上作了讲话。其中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

关于按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

照样开会。惟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毛　泽　东

十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十一时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昨天林彪同志要我们请示主席，是否主席还在考虑目前就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主席认为无需更动，即照通知进行。究如何为好，请主席批示。"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

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

一

即送陈伯达同志：

看过，可用。未完部分请送来一阅。看过的这几部分，有几处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2]，是否妥当，请酌。建议：你讲过之后，印发给到会各同志，讨论几天，提出修改意见。

毛　泽　东

十月十五日下午八时半

二

退陈伯达同志：

可用。只在第二页改了几个字[3]。建议全文立即付印，以便一面讲，一面发给听众。

毛　泽　东

十月十五日夜

三

即送陈伯达同志。

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4〕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毛　泽　东

十月廿四日廿三时

四

退陈伯达同志：

第一步似以发至县、团级为宜。待县、团级以上多数干部思想通了，再往下发。究竟如何处理为好，请你们商量酌定。

毛　泽　东

十一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共四个部分：（一）形势大好；（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根据毛主席的批示，这

个讲话稿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陈伯达在大会发了言。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办公厅将几经修改后的这个讲话稿印发至县团级。本篇一是毛泽东对陈伯达送审的讲话草稿前三部分的批语；本篇二是对这个讲话草稿最后一部分的批语；本篇三是对陈伯达十月二十四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本篇四是对陈伯达十一月五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

〔2〕 陈伯达的讲话草稿第三页说："九月二十五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各地来的学生，曾经有个建议：如果高干子弟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普通工农兵和普通干部（江青同志提议加普通干部，比较完全）的子弟来担任。"毛泽东将括号内的"江青同志"改为"有同志"。讲话草稿第七页说：高干子弟"有许多是好的、比较好的，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此外，毛泽东还在其他几处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3〕 陈伯达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午夜送审的讲话草稿第四部分第二页说："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宣传这种谬论的人，他们利用小孩子们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毛泽东审阅时把其中的"小孩子们"改为"一部分年轻人"。

〔4〕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讲话修改稿第三部分的末尾加了一段话："我们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广大工农群众，广大青少年，都必须掌握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注意'决定'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而在工作中尽自己的最大革命义务。"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2]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3]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4]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5]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6]，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7]；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8]；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9]。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10]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11〕，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2〕，批判胡适〔13〕，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14〕，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

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15〕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

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

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16〕。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送审的这个讲话记录稿作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并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就照这样吧，我改了几个字。暂不发出。"

〔2〕 马林科夫，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五五年二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一九五七年六月被撤职。

〔3〕 指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4〕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纪要内容共二十三条，因此简称"二十三条"。

〔5〕 吴晗，见本册第45页注〔8〕。

〔6〕 指《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是由江青与张春桥在上海密谋策划，由姚文元执笔起草的。

〔7〕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8〕 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见本册第87—88页。

〔9〕 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见本册第90页。

〔10〕 这句话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的。见本册第100页。

〔11〕 指一九五一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12〕 指一九五四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批判运动。

〔13〕 指一九五四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

〔14〕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

〔15〕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16〕 刘少奇，参见本册第90页注〔1〕。邓小平，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同刘少奇一起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被指责为制订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错误的批判。后来被错误地当作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受到批判和迫害。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以恩维尔·霍查[2]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3]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

子不会太长了。

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绝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这份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贺电，是由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

〔2〕 恩维尔·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3〕 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

对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七日）

一

同意这样修改〔2〕。另外有些个别字句的改动〔3〕，请酌定。

毛　泽　东

十一月四日上午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思想、意识两词不宜联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林彪同志：

同意这样修改〔4〕。在第6页、第10页上我作了一点修改〔5〕，请酌定。

毛　泽　东

十一月七日下午六时半

根据手稿刊印。

四

去掉十一字有利。

五

这是陈伯达同志写上的，我只是同意他们写上。

六

对冯定〔6〕的批判我没有与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毛泽东对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有过多次批语和修改。本篇一、二是写在林彪十一月三日夜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三至六是写在最后付印前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上的批语。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这个讲话稿印发到县团级。

〔2〕　林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夜送审的讲话修改稿，是中

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的。主要修改之处是在第十二页上加写了以下两段话："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损人利己。他们为了自己发财，自己得利，而不惜让千百万人破家荡产。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出发来看世界，就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我们就是需要培养为公的人。为公也有不同的阶级性。我们所说的公，是人民的公，无产阶级的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在修改稿上，陈伯达向林彪报告说："根据主席的指示，十二页作了重要的修改，请审阅，并请报告主席。"林彪向毛泽东送审时写道："您的指示很好，我完全同意，现将伯达同志修改稿送上，请再审阅指示。"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是对加写的这两段话说的。

〔3〕 林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夜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中，多处用了"思想意识"一词，毛泽东审阅时均作了修改，有的改为"意识形态"，有的改为"思想领域"，还有几处删去了其中的"意识"二字。为此，他还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对于这个修改稿，他所作的文字改动还有：在第十一页，将"共产主义就是无私"改为"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在第十三页，将"毛主席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改为"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在第十四页，将"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分方面，哪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一句中的"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改为"也是有影响的"；在第十五页，删去了"毛主席的路线已经胜利了"一句。此

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4〕 林彪讲话修改稿在最后付印前曾再次送毛泽东审阅。这个稿子除照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审改稿进行修改外，又作了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

〔5〕 林彪讲话修改稿第六页写道："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间，修改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经典的观点，把它当成国家大事，当成政治问题。"毛泽东阅审时，删去了其中的"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十一个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四；在其中"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句之前，加上了"同意"二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五。在第十页讲到"近年来对杨献珍、冯定的批判"处，毛泽东删去了冯定的名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六。

〔6〕 冯定，一九五七年由毛泽东提名从上海调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系教授。一九六四年受到错误批判。

对参加接见全国各地师生、红卫兵的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1〕

根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万师生和红卫兵。这是他十一月十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接见的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说的一句话。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串连问题的通知稿和补充通知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二日）

一

退总理照办。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六日廿四时

二

退总理照办。

毛　泽　东

十二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稿上。通知稿中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

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通知。本篇二写在周恩来十二月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稿上。补充通知稿在十一月十六日通知的基础上，对外地来京和在外地串连的师生、红卫兵离京与返回原地问题作出了四条具体的补充规定。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删去。

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1]

（一九六六年）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2〕，学三八作风〔3〕，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4〕，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中，在“毛主席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之后，引用了这段话。

〔2〕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3〕　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

泼”八个字。

〔4〕 三大纪律，指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指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对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一

改了一点〔2〕，供小组〔3〕同志们参考。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退江青：

又有点修改〔4〕，似较妥当些。

毛　泽　东

十一月廿八日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

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则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四

这时，我才充分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同志们，朋友们，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据说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的问题，可是有的同志没有请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有过多次批语和修改。本篇一是他对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江青十一月二十七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二十四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四是对二十七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三、四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北京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

〔2〕 除本篇三外，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审稿还作了一些修改。此稿第六至七页写道：“北京京剧一团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给我的信，我倒是都看了。只是因为工作太忙，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亲自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始终是关心的，重视的。”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后一句话改为：“只是因为工作忙一些，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关心的。”第七页写道：“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这是你们团里一批想革命的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和我一块努力的结果。”毛泽东审阅时，在其中的“和我一块努力”后面，加上“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十四个字。此外，毛泽东对这个送审稿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方面的修改。

〔3〕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4〕 除本篇四外，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送审稿还作了一些修改。在第一页，将“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文学艺术”改为“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在第三页，删去了“忠于毛主席”五个字；在第七页，将“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改为“北京京剧一团

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在第十页，将“对于我们党内的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为“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外，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方面的修改。

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具有现代工业、集体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任务和制定的宏伟纲领，为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开辟了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阿尔巴尼亚人民正满怀信心地沿着劳动党所指引的方向，

英勇地向前迈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英雄的阿尔巴尼亚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堡垒。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让我们共同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起，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进行到底。

祝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中央关于刘澜涛[1]出狱问题的复电稿和张闻天有关证明材料的批语[2]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九六七年二月）

一

照办。

二

张闻天[3]关于一九三六年处理北方局领导人，要求中央批准履行“简单手续”，以便早日释放关在北平监狱中的干部，给中央的信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常委及中央文革小组）

汪[4]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刘澜涛，一九三一年在天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

一九三六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薄一波等共六十一人履行简单手续后集体出狱。“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一九七八年被平反。

〔2〕 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来信”，“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现拟电如另纸。如妥，请批发”。周恩来代拟的中央给西北局复电指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本篇一就写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本篇二写在张闻天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给毛泽东等的信上。张闻天在信后附送了一份证明材料。材料中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3〕 张闻天，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负总责。

〔4〕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新闻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

退总理：

已作修改，请再酌。

毛　泽　东

十二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送审的新闻稿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同意，现送请主席审批。在第7、9、13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三处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等部门的一些领导人的名字。这篇新闻稿发表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

对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退总理办。

请林彪〔2〕同志主持开会通过，旋即发出。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给毛泽东、林彪的送审报告上。周恩来写道："通过这一文件的手续，请主席考虑，是在主席处约集常委和文革小组的少数同志一谈，还是仍采用上次方式请林彪同志主持召集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一议，究以何者为好，请主席批示。"周恩来送审的中共中央意见共十条：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狠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

一般不派工作队。可以考虑派些少而精的观察员。三、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的问题。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文化大革命也要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四、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五、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供应工作。六、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在农村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连。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七、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在斗争中，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文斗，不要武斗。防止坏人挑起宗派斗争。八、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上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等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九、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

农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应当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十、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文件。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关于不要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等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关锋同志：

都不要引用。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写信说，“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稿，引用了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引用了主席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请您考虑引用主席这些话，公开发表出来，是否妥当”。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关锋的这封信上。《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发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没有引用毛泽东的大字报和批注。

对李雪峰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的批语[1]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一

伯达[2]同志：

此件[3]不知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都有没有？请你们议一议，此件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有发给各地作参考之用的价值？因为各地很多同志至今还没有如实地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的决心，极有帮助他们的必要，你看如何？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六日

二

退李雪峰同志：

修改得好，可照此发出。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的批语；本篇二是在李雪峰十二月二十七日送审的这个检讨要点修改稿上的批语。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3〕 指李雪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主要是检讨他从六月初至七月中旬大约五十天时间内，在领导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所谓方向、路线错误。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雪峰的这个检讨要点。

对黑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陈伯达〔1〕同志：

请你和小组〔2〕同志们看一看这个文件〔3〕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我看似乎比雪峰同志那个检讨〔4〕还要好一些。文尾所说附件〔5〕还未收到。

毛　泽　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2〕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3〕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中央并东北局的报告。报告中说，我省于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二月七日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和怎样正确对待自己这三个主要问题。会议分为四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发扬民主，鸣放辩论；打通思想，统一认识；总结会议，安排工作。每段各有重点又互相联系，步步深

入。打通思想，挽救干部，纵贯会议始终。整个会议过程，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到县团级党委参考。

〔4〕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参见本册第178页注〔3〕。

〔5〕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查和今后运动意见》。

对黑龙江省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请示报告[1]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伯达[2]同志：

（一）应复电，同意按他们意见去做；（二）请省委在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

以上请酌办。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给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当前随着城乡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多数城市街道的文化大革命也将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有许多问题急需明确。主要是：一、街道运动的重点。我们意见应该是斗争党内（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二、街道居委会的主任，我们认为不能算作当权派。三、在街道文化大革命

中，我们认为应该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职工家属和革命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四、街道文化大革命要结合“四清”进行，市委、区委可以派人巡视，了解情况，但不予干涉、领导。五、街道中的阶级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些不良分子已参加并把持了群众组织，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为好？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黑龙江省委复电，同意按他们的意见去做，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要保护和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

（一九六六年）

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1〕

根据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发表《〈二月提纲〉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黑纲领》（署名任立新）的文章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文中说："毛主席在开始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多次指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

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去公开检查的信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2]。

毛 泽 东

一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刘少奇，参见本册第90页注〔1〕。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毛泽东阅信后，写了这个批语。

〔2〕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凌晨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1]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一月六日，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解放日报》。本篇是毛泽东一月八日针对这两个报社夺权问题的谈话。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的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伯达〔1〕同志及小组〔2〕同志们：

（一）此两件〔3〕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4〕，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毛　泽　东

一月十日上午五时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5〕不要发了，上海这个〔6〕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7〕。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2〕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3〕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报送的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这两篇电讯稿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等报刊。

〔4〕 这个贺电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发出，载于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等报刊。

〔5〕 指陈伯达、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这个通知后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印发，所署日期为一月十一日。

〔6〕 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的《紧急通告》。

〔7〕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

对《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等五份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一

总理、伯达、江青〔1〕同志：

两件〔2〕及另三件〔3〕已阅，很好。请林彪〔4〕同志主持，在今日下午或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有文革小组及其他某些同志参加，将五个文件讨论、通过，然后发出。如同意，请告林彪同志。

毛　泽　东

一月十一日上午二时

二

同意这三个文件〔3〕，一并在今天或明天的政治局会议通过。

毛　泽　东

一月十一日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总理，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 指周恩来等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稿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均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3〕 指陈伯达、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这三件的日期均署为一月十一日，一月十三日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发出。

〔4〕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对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等三个文件[1]的批语[2]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十三日）

一

同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恩来[3]同志：

因是重要文件，应当由政治局通过，请你酌办。

毛　泽　东

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时

三

已请总理酌处。

毛　泽　东

一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的三个文件：一、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通知稿写道，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有一些地方党委，借保证党和国家机密安全及党内文电正常传递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塞进军事机关，甚至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二、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规定稿指出："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作出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六项具体规定。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这个规定。三、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关于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

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甚至有的参与了压制、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各级党委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

〔2〕 本篇一、二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为送审这三个文件给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的报告（林彪当日即转报毛泽东）上；本篇三写在陈伯达、江青同日为送审这三个文件给毛泽东的报告上。

〔3〕 恩来，即周恩来，当时任国务院总理。

对《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伯达同志：

写得很好。

毛　泽　东

一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送审的这篇文稿上。陈伯达送审时在文稿上写有："王力和关锋两同志给《红旗》写了一篇评论，请顺阅！"王力、关锋，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后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总理〔2〕：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一日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给总政治部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上。电报反映了贵州某造反派负责人及其总部的若干问题，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

〔2〕 总理，指周恩来。

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去电制止冲突报告[1]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总理〔2〕：

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3〕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毛　泽　东

一月廿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延边自治州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东北局、吉林省委的这个报告说，十八日下午三时，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系统同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因为《延边日报》的接管问题发生武斗，已造成伤亡，规模很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州委三次派人到双方做工作，要求他们派出代表协商解决，均未成功。现在他们不信任州委，州委无法进行工作，事态发展又十分严重，急请中央文革给双方来电话或电报，制

止冲突。

〔2〕 总理，指周恩来。

〔3〕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

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1]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毛　泽　东

一月廿一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2〕，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中央军委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

年一月二十三日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参见本册第199页注〔1〕。

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上。决定稿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精神，作出了五条指示：（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决定。

要节约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

一

要节约闹革命。〔1〕

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二

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2〕

根据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社论《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社论写道："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节约闹革命。'"

〔2〕《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发表的社论《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社论写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最近又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

关于研究军队夺权范围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林彪〔2〕同志：

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3〕。

毛　泽　东

一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上。这期要报上登载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材料，反映了部队一些已被夺权单位的情况，并提出以下几个需要研究加以统一规定的问题：（1）什么样的院校领导权可以夺，什么样的院校领导权不能夺？（2）各个左派组织是单独夺，还是联合夺？（3）警卫分队的权交给谁？（4）机关科研单位能否夺权？（5）医院、文工团等单位是按照机关还是按照院校对待，能不能夺权？

〔2〕　林彪，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3〕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规定指出：（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三）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

对军委八条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月）

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六日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停一周后再回去。

又　及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二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三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总理：

同意，照办。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五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送

审的中央军委命令稿共七条。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审阅时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一。一月二十八日，根据毛泽东批示修改为八条的中央军委命令稿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二；对这次命令稿中根据毛泽东一月二十六日批示内容写成的第五条，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文字，即本篇三。经毛泽东两次批示修改后的中央军委命令稿指出：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二月三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通知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四。在这个通知稿开列的“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的机关名单中，毛泽东加写了“各级银行”。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又将中共中央通知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五。中共中央通知下发时，日期署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军委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为此，通知还作了五点具体说明，并要求各地将此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1]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2]。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章伯森，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写报告说，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中央反映两点情况：一、目前湖南文化革命运动形势越来越好。造反派在政治上已完全取得优势，保守派正在分化瓦解中。但省委工作暂时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

除党籍。自一月中旬以来，要求开除党籍的更是络绎不绝，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章伯森在电报中还请求中央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并请中央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指示。

〔2〕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处理贵州问题给周恩来的批语中指出，应将贵州有关各方的代表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

对谭震林[1]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林彪、恩来[2]同志：

此件[3]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毛 泽 东

一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 指谭震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给毛泽东等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报告对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一

林彪[2]同志：

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

毛　泽　东

一月卅日

如有修改，请告伯达。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中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

权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所有这些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都是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这些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多做自我批评，而不要互相攻击。

三

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四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3〕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五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六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

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

七

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4〕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送审的社论稿的批语。陈伯达在送审稿上写道："王力、关锋二同志为红旗杂志准备了一篇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请审阅！"王力、关锋，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本篇二至七是毛泽东对社论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提前转载。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3〕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这句话，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中，作为毛泽东的话用黑体字排印。

〔4〕 这句话在《红旗》杂志社论中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

关于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等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恩来〔1〕同志：

这个通告〔2〕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3〕，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

毛 泽 东

一月卅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恩来，即周恩来。

〔2〕 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载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贵州报》。通告宣布“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等四十个造反组织，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义，于一月二十四日接管了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和中共贵阳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转载了这个通告。

〔3〕 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后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1〕

根据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发表的社论《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并写道："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提出的战略口号。"

关于应说服红卫兵让王任重[1]就医的批语[2]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

林、周〔3〕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

毛　泽　东

二月二日

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王任重，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六七年一月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

〔2〕 这个批语写在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王任重病重垂危，现被揪斗，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王任重最近以来病情加重。为了使他能进一步检查错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能让王就医一段时间，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请武汉军区党委协助省委办理此事。"

〔3〕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在西藏军区党委一份电报[1]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八日）

一

林彪、恩来、叶、聂、徐[2]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3]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

毛　泽　东

二月七日

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又及

二

已办，存案。

毛　泽　东

二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说，“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认为张国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说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群众因不明真相，动荡很大，军区机关一部分干部和驻拉萨部队的部分干部战士也出现了思想混乱。此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为此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又给“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复电，指出中央军委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群众做些工作。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叶，指叶剑英，聂，指聂荣臻，徐，指徐向前，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3〕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王其梅，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

同卡博、巴卢库的一段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

根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斯尼·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贝基尔·巴卢库等时谈话中的一段话。林彪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在中共九大上的政治报告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这个报告四月十四日在九大上通过，四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一

有一些修改。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毛泽东

二月九日上午

二

林彪同志：

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

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

毛 泽 东

二月九日下午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三）略

（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2〕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送审的这个规定稿，毛泽东作过两次修改。本篇一写在第一次送审稿上；本篇二是写在第二次送审稿上；本篇三是经毛泽东两次修改后的中央军委规定稿，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给林彪写信说："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已经收回）。请报主席。"

关于播发《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伯达[2]同志：

请与小组[3]同志研究，此文可否公开发表，并予广播？是否有要修改的地方，也请酌处。

毛 泽 东

二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三九〇期上。这期简报登载了一篇题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的材料。材料说，黑龙江省造反派在夺权斗争中的经验是：一、根据当地的具体斗争情况，鲜明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部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军队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二、在夺取省委的领导大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中，为最后夺取省委大权作好舆论准备，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三、坚决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打击反动力量，

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四、夺权斗争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这篇材料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3〕 小组，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和补充规定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

一

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

二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送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审阅的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上。叶剑英在送审报告中写道："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三十二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二月十日，林彪将这个规定稿转

送毛泽东审阅。经讨论修改后，中央军委规定于二月十一日发出，共七条：一、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命令（参见本册第204页注〔1〕），是个重要的文件，必须广泛宣传，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学习讨论，认真抓好活思想，务使大家深刻认识颁发这个命令的伟大意义，提高执行命令的自觉性。二、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由军委决定已经开展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必须听候军委命令。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四、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帝、修、反加紧反华，我军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因此，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五、根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

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六、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到群众中去，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同群众紧密结合，一道闹革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凡是没有上级命令停职、罢官的领导干部，应该坚守岗位，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七、在运动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本篇二写在林彪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送审的《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稿上。中央军委二月二十七日下发的这个补充规定指出，为了保持军队领导机关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进一步贯彻军委指示，特决定：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对王明昆关于成立“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1]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

林彪、恩来[2]同志：

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毛　泽　东

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编印的《要事汇报》第八号上，登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的电话汇报。王明昆说：（一）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

大排除在外，成立了“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今晚开会发表“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声明。（二）西安东郊二八工厂十日被该厂保守派破坏，估计半年可能修复生产。今晚又有一二万人开大会，可能是要砸八〇三厂或者冲击省军区机关。有谣传说，要在二十日以前把东郊的工厂都砸掉。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处理，请中央文革迅速予以指示。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

林彪〔2〕同志：

请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训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一1000字左右的总结，发到全国参考。又大专学校也要作一个总结，发往全国。请酌。

毛　泽　东

二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文化革命动向》登载的《北京两个中学进行军训的情况》一文旁。文章说，驻京部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最近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进行集训革命师生的试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两个学校的军训都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以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主要教材，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友，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消除各群众组织之间的隔阂。第二阶段以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为主

要教材，引导师生深入批判阻碍革命派大联合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挖私心，大破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实行革命组织大联合、大夺权。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

一

退总理：

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2]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

毛　泽　东

二月十八日下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审阅、十八日由周恩来转报毛泽东的。本篇一写在周恩来二月

十八日的送审稿上。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一些修改。社论稿第八页讲到对犯错误干部的使用问题时写道："有的干部，还可以吸收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将其中的"有的干部"改为"有许多干部"。在社论稿的末尾，毛泽东删去了以下三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此外，还有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本篇二写在陈伯达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王力二月二十二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陈伯达等在这次送审稿上写道："总理主持下开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们又做了一次修改。"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三日提前转载。

〔2〕 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在向毛泽东转送这篇社论稿时写道："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的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在社论稿第二部分《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中的三段文字旁，周恩来划了竖线，并批示："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二十二日的送审稿上，在这一部分加写了两段文字。一段文字是："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

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另一段文字是：“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

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开展军训的两个总结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三月二十三日）

一

林彪同志：

（一）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时间四小时。（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以上请酌办。

毛　泽　东

二月十九日

此两件总理[2]阅后送林彪同志。

根据手稿刊印。

二

都不要发表。各地经验已超过北京。我的批语也有些不适应新情况。因此都不宜发表。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根据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二月十八日写出了关于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政训练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二月十九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写在林彪送审的前一个报告的首页上。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王力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大中学的军政训练，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同志主张在报上发表。主席批示的两个关于北京的军政训练的文件，他们也主张修改后发表。请主席决定。"本篇二就写在陈伯达、王力的报告上。北京卫戍区的这两个总结报告，后来既没有由中央转发全国，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

〔2〕 总理，指周恩来。

在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新闻稿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伯达、王力[2]同志：

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

毛　泽　东

二月廿日

可分两天发表。第一天发前三件，后一件在第二天发。[3]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报送的新闻稿共四件，分别是：《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贵州省材料四份，内容较丰富，关于三结合的经验也说得好。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以发表，名称是否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请批示！"毛泽东的批语，写在陈伯达报送的第一篇新闻稿上。

〔2〕 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3〕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前三篇新闻稿；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第四篇新闻稿。这四份新闻稿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一词，发表时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对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林彪〔2〕同志阅后，退汪东兴〔3〕照办。

毛　泽　东

二月廿日上午十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信稿上。信中指出，贫下中农是农村中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当这春耕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要善于同贫下中农一起商量，同一切劳动群众一起商量，掀起一个春耕生产的高潮。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

对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挑动宗派纠纷。他们必须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认真地继续进行劳动改造。在“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自己，不许反攻倒算。建议你们考虑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布置春耕生产工作。建议你们开好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讨论春耕生产工作。同时，还建议人民解放军驻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当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了这封信，要求在农村中宣读和张贴。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3〕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了解广东省委领导干部情况等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

一

总理：

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2〕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3〕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二

总理：

同意这样做。

毛　泽　东

二月廿八日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报告后写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广东方面同志有黄永胜、陈郁、赵紫阳、陈德（当时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区梦觉等七人。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2〕 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委。区梦觉，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

〔3〕 陈郁，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省长。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

关于公开报道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搞联合等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伯达、王力[2]同志：

此件似可公开报导。又，《文汇报》有一篇题为《革命不分先后》的社论[3]，略加修改后，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北京其他报纸早已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政治嗅觉，似不甚强。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四号上。这期快报登载的《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的材料说，贵阳棉纺厂在夺权以后，按车间等行政单位搞联合，对文化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他们把这种联合的方式叫做归口大联合，是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材料，题目改为《用毛泽东思想做为大联合的灵魂！贵阳棉纺厂按行政部门搞联合，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革命和

生产出现新面貌》。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的社论。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3〕 指《文汇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发表的社论，原题为《造反不分先后》，《人民日报》已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转载。社论指出，革命有早有迟，造反有先有后。我们的态度是：不管革命迟早，不分造反先后，真革命、真造反，我们总是热忱欢迎的。今天造反，今天欢迎；明天造反，明天欢迎。对于一切愿意革命的干部来说，应该遵循毛主席"只争朝夕"的教导，立即起来造反。任何歧视、排斥干部起来造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必须痛加驳斥。

对张日清《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林彪同志：

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

毛　泽　东

二月廿七日十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张日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王力、关锋将这篇文章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审阅时写道："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干部会议各同志参考。"林彪阅后转送毛泽东，毛泽东的批语写在陈伯达等的送审稿上。张日清的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

关于要注意反革命复辟现象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毛　泽　东

二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二号上。这期《快报》登载了题为《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的材料。材料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中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把这期《快报》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

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

林彪、恩来〔1〕同志：

此件〔2〕可印发军级会议〔3〕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4〕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毛　泽　东

三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给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等的报告。报告说，

沈阳军区领导机关及驻沈各军事机关，于二月下旬共抽调七百八十名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沈阳市一百二十二个大、中型工厂和部分大专院校，运用有线广播、口头讲解等办法，反复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十六条、工业十条、八项命令以及中央、军委的其他有关通知、指示，党的政策一经讲清后，部分工厂由于少数人闹事而产生的不正常现象，逐步得到纠正，生产普遍上升，武斗基本制止。

〔3〕 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召开的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

〔4〕 今属黑龙江省尚志市。

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林彪、恩来〔1〕、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2〕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　泽　东

三月七日

根据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印。已节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有手稿）

注 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等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关于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给北京军区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天津市延安初级中学在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组织多而乱，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面貌，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转发给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并拟题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指示》。因这个批语写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因此又简称为“三·七”指示。

对贵州省军区支援左派工作经验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戚本禹〔1〕同志：

此件〔2〕看过，不错。但有些问题写得不具体，例如第一个问题没有举例，究竟怎样解决的，看不明白。是否请他们写一个较具体的可供发表的报导送来，请酌处。

毛 泽 东

三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2〕 指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十七号上登载的《贵州省军区关于怎样做好支援左派工作的经验》材料。材料说，贵州省军区党委在二月一日至三日召开了有各师、军分区主要领导和军区机关处以上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在讨论怎样搞好支援左派工作时，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一、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中央已经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就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过去由于认识不清，所以一接触

实际，就迷失了方向。二、善于发现左派是我们采取支持行动的前提。具体方法是：（一）善于通过分析各派的特点来发现左派；（二）注意从各派与上面的联系来发现左派；（三）到群众中去倾听各方面意见，防止片面性。三、克服怕字，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夺权。

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林彪、恩来〔1〕、文革小组：

此件〔2〕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毛　泽　东

三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党委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转发的四川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报告。报告说，以铁五师为主组成的支左部队来到渡口后，把支持左派的工作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左派。在对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做法是：1．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2．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使之成为思想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3．帮助他们保持清醒头脑，

坚持斗争大方向。铁道兵党委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将渡口驻军的经验和铁道兵党委的批语一起转发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并指出："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一

林彪[2]同志阅后，退文革小组。

毛　泽　东

三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　这篇社论稿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力、关锋撰写的。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将这篇社论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和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同时，有些人也在利用这个问题，搞复辟活动。针对这种情况，王力、关锋同志拟了一篇社论，阐说主席的革命三结合方针，以便引起注意。"本篇一是毛泽东写在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社论稿中加写的一段话。这篇社论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人民日报》三月十日提前转载。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1〕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中，在“毛主席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人民日报》三月十日提前转载了《红旗》杂志这篇社论，并以语录形式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对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

总理[2]：

工人代表大会还没有开，中学和农民的代表大会还无消息。开全市代表大会并选举革委会，似以在三月下旬为宜，请与谢富治同志酌处。

毛　泽　东

三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等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中说，中央文革指示我们几个人负责筹备北京市的夺权工作。经过一个月的酝酿协商，准备在最近成立九十多人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临时革命委员会。如主席、中央同意，我们拟在本周召开会议，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

〔2〕 总理，指周恩来。

关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各省、市亦宜照此〔1〕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毛　泽　东

三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指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说，昨夜得到主席关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要先开工人、农民、中学生代表会或群众大会的指示，我已告谢富治并给常委和文革小组各同志传阅，他们都很赞成。今早，我照此方针，以电话告天津解学恭（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

关于推迟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

以推迟到三月下旬成立，照总理十日意见〔2〕办理为宜。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中说，天津市革命学生组织多已趋向联合，五日已开了红代会会议。工人革命组织已按口分系统组织，多已组成，达十七万人。中学生革命组织较差。在本周内，他们拟开各方协商会议，商定革委会及其常委会名单。群众大会预定十二日开，在会上宣布成立天津市临时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等。

〔2〕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委会的程序。

对中央转发北京卫戍区布告的指示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一九六七年三月起草了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布告全文如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特任命×××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为副主任。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要从政治思想上支持。也就是要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群众自己的力量，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二、厂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和业务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应当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

批转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的通知》和中央有关的政策规定。三、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努力工作，遵守劳动纪律，服从上级指挥。建立革命秩序，严格出入制度。四、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强调摆事实，讲道理，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减少脱产人员，反对铺张浪费。坚决同经济主义进行斗争，坚决同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进行斗争。六、为了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提倡厂矿内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做到按生产系统和行政单位编组。七、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在本单位或本市内进行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任何革命组织联合厂矿外革命组织召开大会，必须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八、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成立筹备组织，推动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九、厂矿一切外出长期不归的人员，限一个月内回到本单位，如在规定时间内仍不回厂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十、厂矿全体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破坏国家财产、破坏生产的人，要依法惩处。十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生产，从事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并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十二、厂矿全体革命同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厂矿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三月十五

日，周恩来将北京卫戍区的这个布告报送毛泽东等时写道："这一文件经过北京卫戍区起草、文革小组同志修改，并在今晚钓鱼台碰头会上修改通过，现在送上请予审阅，并请主席批准。在批准后，并拟发给全国参考。"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的送审报告上。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卫戍区的这个布告。

对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信稿上。信中要求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应该巩固劳动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在文化革命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产品的高质量，要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材的不良现象作斗争。信中指出，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研究精兵简政的经验。既要大大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又要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要注意节约闹革命。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高国家主人翁的伟大责任感，好好保护国家财产。如有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

格惩办。党中央号召，一切在厂矿中工作的革命干部，应该带头做好各项工作，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尽最大的努力。党中央相信，一切厂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严格进行自我批评，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当好群众的小学生，在工作中改造自己，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工人群众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混进厂矿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绝对不许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职工之间的团结，制造和挑动派别纠纷。对他们的处理，可以根据他们的政治立场、劳动态度和厂矿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你们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合作。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封信，要求在一切厂矿和基本建设单位中宣读和张贴。

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

林彪、恩来〔1〕同志：

此件〔2〕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毛　泽　东

三月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的材料。材料说，齐齐哈尔铁路局管辖线路阻塞现象严重，每天都接到全国各地发来大批请求运送物资的告急书。要满足这些需要，每天必须运出

五千一百多个车皮，而目前他们每天只能装运一千七百至一千八百个，外地运来的物资，每天也有二百多个车皮卸不下来。铁路局的事故大大增加，到三月十五日，已发生行车事故三百二十六起，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这样短的时间内，事故之多，损失之重，是该局历史上罕见的。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纪律涣散，不听指挥；派别多（全局二百多个组织），不但增加了脱产人员，而且经常争论，影响工作；有些人强调破框框，而把一些必需执行的规章制度随便破除了；领导干部“怕”字当头，放弃领导。三月十八日，该局军代表介入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三结合”的抓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并计划在各分局也成立指挥部，代替长期瘫痪的领导机构。但全局军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困难仍很大，迫切希望驻军派更多的干部去加强领导。

对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送审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上。通知稿指出，目前各地各单位正集中力量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机力机构，同时在外串连的学生、群众刚刚返回，本地本单位斗、批、改的任务很繁重，因此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后大串连的计划，望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当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了这个通知。

对聂荣臻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退总理照办。

毛　泽　东

三月廿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据了解，现在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许多单位领导瘫痪，研究工作陷于停顿，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这种情况必须迅速予以改变。建议对这些单位实行军事接管，接管工作由国防科委组织进行。按照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精神，迅速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接管后，将遇到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强烈提出的改变现行领导体制的问题，建议一面恢复生产，一面即着手将国防工业部门及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国防科研机构，结合批改，通盘考

虑，进行一次全面的适当的调整和改组。报告中还提出了调整改组的五条原则。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此向毛泽东等写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精神，经与有关同志商量，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对国防工业各部门的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交国防科委实行军管，并基本同意他所提的调整改组原则，待方案商定后再报批。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商定后将分别报批。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的报告上。

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九七一年三月）

一九六七年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和外事工作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坚决贯彻。现将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军委办事组、中联部和外交部等文电上的一部分重要批示和修改，汇总于后。

（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对澳共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大卫·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二）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在《桑穆加塔桑

就发表主席内部谈话问题的一封信》〔2〕上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桑穆加塔桑在这封信中说："现在，有人告诉我，（同主席）谈话的内容未经同意不得公布。"

（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3〕的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四）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姚文元〔4〕同志转达了毛主席对安斋等同志关于日本革命道路问题的意见的批示。

姚文元同志说：首先我向同志们（安斋库治等同志）转告一个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向安斋库治等同志问候；毛主席看到了日本同志对日本要不要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意见，其中提到了对一九三八年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段论述是否有效的问题。毛主席对此有一个批示。我在这里把毛主席批示的原文念一下。毛主席说："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这就是指的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所写的那篇著名文章《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论述的问题。这篇文章的第一节第一段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毛主席在第一节第二段中完整地、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武装起义的经验。在那一段的最后有这样的话："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毛主席所说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就是指这篇文章中的整个这一段话。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5〕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六）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6〕，作了重要批改。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

（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7〕，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八）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8〕

上批示："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九）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9〕。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十）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10〕（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十一）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十二）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

文件〔11〕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十三）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12〕

（十四）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批示：“不要”。

（十五）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它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了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主席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

（十六）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13〕

（十七）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14〕上的批示：“把离开主

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社论的有关段落如下（毛主席删掉的地方，下边划了粗线；增加的地方，在下边打了加重号）：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赠了亲笔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今天是这一光辉题词的六周年纪念，本报在头版位置上发表了毛主席题词的手迹。毛主席的这个题词，不仅对于日本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且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去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反复地教导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

经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把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这件事，生动地比作为"有的放矢"。毛泽东同志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从而把中国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条原则适用于中国革命，也适用于日本和一切国家的革命。这就是说，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那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

日共宫本〔15〕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借口日本"国内外条件"不同，标榜什么"独立自主"，其实都是鬼话。他们在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所起劲地攻击和反对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竭力

歪曲和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疯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鼓吹所谓“和平革命”，推行所谓“议会道路”。实际上就是不要革命，背叛革命，反对革命。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日本革命事业的可耻叛徒。

今天，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兴起。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日本人民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队伍正在日益成长壮大。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大造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反，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日本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光荣而严肃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真地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体运用到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从日本的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日本革命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把日本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紧密地相结合的过程。

我们相信，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日本真正的革命党，一定会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诞生。它将领导日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

（十八）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16〕

送审稿的第11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十九）一九六八年九月，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主席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主席批注："去掉三条"（即：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十）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

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17〕上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18〕。"

（二十一）一九六九年五月，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月二十四日声明稿〔19〕上批示："可用。略有修改。"

毛主席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将"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

（二十二）一九六九年六月，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20〕，批示："可发"。

毛主席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二十三）某拉丁美洲共产党总书记等人，从一九六九

年三月至十二月间，先后给我党中央和林彪〔21〕同志四次来信，承认过去追随苏修反华是错误的，要求同我“恢复两党关系”。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联部抄印来信的文件上批示：“林彪同志：这些信看来似无恶意。他们被人抛弃，想寻出路。请转康生同志考虑是否可以同他们联系。”

（二十四）一九六九年九月，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十五）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

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二十六）一九七〇年六月，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

等于赠罗之一半。”

（二十七）一九七〇年九月，毛主席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

（二十八）一九七〇年十月，毛主席在外交部起草的给日本社会党成田知巳〔22〕的复信稿上，作了修改。原复信稿中说，“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23〕精神，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走狗、帮凶而进行斗争。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于十月中旬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主席将“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中的“更应”两字圈掉了，将“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改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欢迎……”。

（二十九）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三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

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24〕

（三十一）一九七一年二月，旅游局在《关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中说，一九七一年拟接收外国人来华旅行八百至一千人，对象以左派和对我友好的工农、学生、教职员为主，上层友好人士有计划、有选择地少量接收。毛主席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

（三十二）一九七一年二月，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交活动简报》第二十九期《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四条中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同志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提出意见说：这两段历史应该提，不提中国人容易理解，外国人就不容易理解。提这两段历史事实不仅不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相反人们会通过对当时的各种错误路线的了解，更加体会到毛主席路线的正确。对此，毛主席批示："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三十三）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25〕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

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26〕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刊印。

注　释

〔1〕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本篇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六月八日印发的会议文件之六。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曾将本篇（五）至（十）、（十三）、（十四）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并在通知中指出："最近几个月，毛主席对对外宣传工作，作了极为重要而严肃的批示。现将毛主席的多次批示，印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党、政、军、群革命领导干部和外事工作干部中进行传达。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正确理解，坚决执行。一定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检查对外宣传工作，肯定成绩，纠正缺点，总结经验，提出改进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对外宣传工作，做得更广泛深入，更切合实际，更科学，更有效。"

〔2〕　指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给在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的信。信中就他在中国访问后回国时在机场谈话和回国后发表的文章中透露了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示歉意。信中说，这"完全不是故意的"。"如果你能够找个时间去会见康生同志或刘宁一同志，准确地解释一下产生这个错误的情况，我不胜感激"。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代部长。

〔3〕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的这份简报说，日本左派理论刊物《革命战士》编辑安斋库治等三人在学习“人民战争”问题时，发表了如下一些观点：(一)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一节中，曾经谈到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以及这些国家的武装斗争问题。如果说像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就是说毛主席这段话过时了，要加以修正。对于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应以毛主席的这段话作基础来理解，即这里所说的普遍意义，不包括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二)在工人阶级占优势的国家里，应首先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三)在日本，城市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不是薄弱环节。(四)目前在日本是进行武装斗争的教育和组织准备阶段，不是实行武装斗争的阶段，也不是进行武装起义的时机。(五)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从中国回日本的同志，都说日本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一些同志关于要日本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种种暗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六)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不能说十月革命道路只有特殊意义。

〔4〕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5〕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关于援越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鉴于援越飞机要在我国使用一段时间，建议和我空军使用的飞机一样，喷上毛主席语录和在座舱内镶上毛主席像章。改装训练结束后，原样移交给越方。

〔6〕 指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稿。

〔7〕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印发的文件中原文如此。

〔8〕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说，一九六七年三月，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来访时，对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提出批评，认为我们的对外英语宣传，内容很好，但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与英语国家的群众格格不入，易引起反感。主要原因是没有调查研究宣传对象，报道的事实和背景没有交待清楚，文字冗长累赘，形容词太多，译文质量差，外国人不易理解和接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他又委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达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甚至说“中国同志应很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希尔是反对威尔科克斯的意见的。他认为，威尔科克斯提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而不仅是宣传形式问题。问题的中心是对毛主席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作何评价。他认为，为了宣传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就不能不十分强烈地、始终一贯地、反复地进行宣传，这样做对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对西方世界，是非常必需的。康生等在报告中说，对他们的意见，我们主要答复了三点：一、愿意倾听兄弟党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二、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我们是非常克制的，不但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而且克制得过分了，群众有不少意见。在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和宣传上，我们完全同意希尔的意见。三、在宣传形式和语言方面，我们的工作是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的。改进对外宣传工作，需有一个时间和过程。

〔9〕 毛泽东对这个贺电稿的批示全文是：“有修改。请注意：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

嘘，强加于人。毛泽东　一九六八年三月廿七日”

〔10〕康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毛泽东的这个请示报告中说，缅甸共产党的声明，要求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不便给他们改，他们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是兄弟党中央的文件，他们在国内都讲毛泽东思想，如果要求他们改，可能发生误会，不登也不好，请主席指示，是否可以登载。这个声明后来照原文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上。毛泽东对康生这个请示报告的批语，除本篇（十）中所引用的一段外，在文中“一般地说”之前，还有一句：“这些材料，请你们酌定，我不看了。”

〔11〕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七机部某办公室“正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召开415会议”，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恳切请求毛主席接见。毛泽东审阅时，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下面划了两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这个批语除本篇（十二）中所引用的一句外，紧接着还有一句：“此事请康老在碰头会上提出并讨论一下措施。”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毛主席的批评，应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12〕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六月八日在转发毛泽东这个批语的指示中指出：“外国人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国际革命运动的影响的材料，可由新华社刊登在内部《参考资料》上。”

〔13〕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给国务院总

理周恩来等写报告说，我援外军事人员现在仍称“军事专家”，“军事专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术权威”的称呼，与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军援外人员身分不相称。我们建议，将“军事专家组”改称“军事工作组”，其人员按行政职务和工作性质，分别称组长、教员和翻译。如有“首席专家”，则改称工作组组长，下辖各军事工作小组。本篇（十六）中的第一个批语写在这个报告上。八月六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再次给毛泽东等写报告，建议将“军事专家组”改称“军事组”。本篇（十六）中第三个批语写在军委办事组八月六日的报告上。本篇（十六）中第二个批语写在八月六日报告的信封上，在这个信封上，毛泽东还写有“林副主席、总理再阅”一句。

〔14〕 这篇社论稿经毛泽东修改后，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

〔15〕 宫本，即宫本显治，当时任日本共产党总书记。

〔16〕 周恩来等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送审的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名义下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共三十条，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第十一条，并写了这个批语。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的批示，已经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各同志中传阅了”。“现在的办法，第一是遵照主席的指示去掉这个口号，即将中央通知发出。第二是可否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这个通知而仍保留第11条，以适应和配合这次国庆的宣传”。毛泽东审阅这封信时，又批示：“去掉11条为好”。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发出的通知中，标语口号共二十九条，删去了送审稿中的第十一条。

〔17〕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18〕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以《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美帝新头目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为题，全文登载了尼克松一月二十日的就职演说。

〔19〕 周恩来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送毛泽东等审阅的这个声明稿，是为答复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声明的。内容共分六个部分：一、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政府蓄意挑起的。二、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都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三、中苏之间存在边界问题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四、苏联政府破坏边界现状，挑起边境冲突。五、到处扩张领土的是苏联政府。六、中国政府主张和平谈判，反对诉诸武力。这个声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0〕 这篇社论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

〔2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22〕 成田知巳，当时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

〔23〕 浅沼，即浅沼稻次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〇年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一九五九年三月，率社会党友好使节团访华，在北京政协礼堂发表演讲，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引起日本各界极大反响。一九六〇年三月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同年十月十二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堂召开的三党党首讲演会上讲演时，被刺身亡。

〔24〕 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曾将这个批语作为《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八个重要文件》之三印发，一九九四年编入《毛泽东外交文选》。

〔25〕 朗诺，当时任"高棉共和国"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武

装部队四星上将总司令。

〔26〕 周恩来的报告中还说到，日本群众得知中国乒乓球队拟参赛后，热烈欢迎，左派组织了五百多人保护我球队，但右派也派人到名古屋企图挑衅，日本政府极为头痛，已派大批警察护卫我队预先分住的旅馆。这将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中国乒乓球队后来参加了这届世乒赛，并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

戚本禹[2]同志：

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3]，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

毛　泽　东

三月廿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4]

三

是翘还是饶，请查一下。〔5〕

四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写在这篇文章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作了转载。

〔2〕 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第五次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这是去年看了《清宫秘史》影片以后写的，最近改了一下，送呈主席一阅。目前，可否联系这部电影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请主席考虑。”这篇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参见本册第90页注〔1〕。

〔3〕 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四外，还在第二页删去了"毛主席"前面的四个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4〕 戚本禹的文章送审稿有一处引用了义和团流传的一首歌谣："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得欢，一个心，杀洋官。"在这旁边，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根据毛泽东的批语，戚本禹在这首歌谣的前后各加写了一段话："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5〕 戚本禹的文章送审稿中有一处写道："影片还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大臣赵舒饶之口说：'请老佛爷降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扫灭洋人，立威天下，大清国运，就在此一举。'"毛泽东在文中"赵舒饶"的"饶"字下划了一道，并写了这个批语。赵舒饶，应为赵舒翘。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送审的决定稿上。决定稿的主要内容是：一、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由沈阳军区派驻大庆地区的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事管制委员会，向油田所属各生产指挥部、各重点单位、各重要居民区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管。二、油田军管会受沈阳军区和石油工业部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接管油田的党政权力，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镇压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油田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三、油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勇挑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现在尚在外地串连的职工，要迅速回到生产岗位。四、要迅速健全和改组各级生产业务领

导班子，积极恢复各级生产指挥系统的正常活动，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五、驻油田的外地师生和外单位职工，应立即回本校、本单位闹革命。六、大庆油田半工半读的学生，都要回原生产单位或本校复课闹革命。要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以学为主。七、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干部。对犯了错误的标兵、红旗手、劳动模范等，应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教育、团结他们。八、职工家属应努力搞好春耕生产，争取今年农业丰收。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这个决定。

在一份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1]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中央文革小组：

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2〕也应来。请商总理〔3〕酌办为盼！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题为《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简报摘要登载了四川省宜宾县田禾三月十四日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来信。

〔2〕 甘渭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3〕 总理，指周恩来。

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一文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王力、关锋[2]同志：

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毛　泽　东

三月廿九日

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们及其他同志看一看。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篇文章是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的名义写的，原题为《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现在的标题是毛泽东审阅时改拟的，原标题加上时间作为副题《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作了转载。

〔2〕 王力、关锋，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他们把《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一文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我们过去调查不够，揭露不够，批判不够。似应在实现革命'三结合'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揭露和批判。一些典型材料，似可发给党内领导同志看看。"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参见本册第90页注〔1〕。

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一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2〕，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　泽　东

三月卅日下午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此处应引几句列宁的原话。〔3〕

三

动物也不是孤立的个体，分为纲、目、属、种，故此句可删。〔4〕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列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5〕

五

因为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有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6〕，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于三月三十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讲话稿上的批语；本篇四、五是毛泽东对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播放林彪这个讲话录音的通知。四月二十四日，中央印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

〔2〕 除本篇四、五外，毛泽东还作了以下几处修改：在第十六页，将“夺取政权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可是都保不住”一句中的“可是都保不住”，改为“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在第二十八页，林彪讲到：“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这样要传至万万世”一句，并将两处“永远的思想财富”中的“永远”二字删去。此外，还有几处个别文字的修改和删节。

〔3〕 林彪讲话稿的第二页讲到，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阶级斗争，改变了形式，有的地方变得更加激烈”。在这句话后面，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印发的林彪讲话中，在此处加写了以下两段话：“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

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4〕 林彪讲话稿的第四页讲到："如果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人，那人同狗、牛、马、天上飞的鸟、水里边游的鱼，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删去了这句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5〕 林彪讲话稿中，这段话原为："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斯大林所不能比的，更不用说什么赫鲁晓夫、什么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头头，那就更不能比了。"

〔6〕 林彪讲话稿中，这句话原为"所有的地方都修了"。

对《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1]一文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王力〔2〕同志：

看过，照发。

毛　泽　东

三月卅日下午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篇《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作了转载。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参见本册第90页注〔1〕。

〔2〕 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话[1]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共五条，其中第二条讲到："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在此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段话。四月一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决定。

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六日）

一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2]，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

毛　泽　东

四月四日

二

林彪同志：

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3]

毛　泽　东

四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4〕

四

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林彪四月五日送审的命令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林彪四月二日送审稿中第一条、第六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还将第三条中“对于确定实查明的反动组织”一句，改为“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删去第四条“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一般的概不追究”一语中“一般的”三个字；把第四条中“不能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

关来划分左、中、右”一句，改为“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些字。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3〕 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发出了这个命令。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十条命令是：（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

两条路线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命令中提到的赵永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六七年二月，“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将青海省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于二月二十三日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的严重事件。赵永夫是当时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指出“一九六七年二月，青海省军区内部发生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4〕 林彪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送审稿中，这句话原为：“对未向我开枪的群众，无论革命的、反动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四月）

一

退江青。

可以，照办。[2]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看过，删了一点。[3]

三

主席说，这篇文章[4]，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

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曾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改。本篇一是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江青四月十七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江青四月十七日送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说：“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对于这次送审稿，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在第五页，对江青讲的历史上“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在第

七页，江青讲到军队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说："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实际上早已经介入了。"在其中"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一句前，毛泽东加了"就许多单位说"一语。在第九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其中的"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一句前，加写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九个字。此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增删。

〔3〕 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还有以下几处：将第四页上"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改为："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删去第六页上"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一句中"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九个字。在第七页，送审稿讲到广州市的文化革命情况时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毛泽东把其中的"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一句改为："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在第九页上，送审稿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创作和教育情况时写道："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是"改为"大量的是"，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全是"。在同一页上，江青讲到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在第十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

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其中的“都是”改为“大量的是”。在第十三页，江青讲到：“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在第十四页，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括号写了“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十个字。此外，对这个讲话稿，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增删。

〔4〕 指《战国策》中的《触詟说赵太后》一文。

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2]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林、周[3]阅后办。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一九六七年四

月二十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写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至四月十九日止，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3〕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林彪、恩来〔2〕同志：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3〕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4〕，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5〕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是看了中共河南省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问题的报告后写的。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

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建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4〕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5〕文敏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纪登奎、戴苏理，当时均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的批语和注文[1]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

林彪、恩来〔2〕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3〕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注

三

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毛注

四

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注

五

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九四〇号上登载的这个材料说，陕西省军区和驻陕部队负责人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北工业大学和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革命派、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工作的意见和批评。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所以训练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的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即本篇二。）部队负责人欢迎和感谢同学们诚恳、善意、坦率的

批评，并因势利导地转入讨论如何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议论中，“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在“李世英同学”五个字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即本篇三。）其中第七条意见是“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这一条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即本篇四。）第八条意见是：“在作好各院校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在这一条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即本篇五。）部队负责人认为，李世英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召集西工大等四校负责人，就如何紧紧把握斗争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本篇一是印发这个材料的批语，写在这期《快报》的报头上。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和干部的大多数

（一九六七年）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1〕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的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了《红旗》杂志的这篇社论，并在第一版单独发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对《〈修养〉[1]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六日、七日）

一

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

毛　泽　东

五月四日

改后应送小组[3]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又及

二

退文革小组。

在第7页，加了几句话[4]，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

毛　泽　东

五月六日

三

照此发表。

毛　泽　东

五月七日下午七时

根据手稿刊印。

四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5]，有陶潜的《桃花源记》[6]，有康有为的《大同书》[7]，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五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

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 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这是刘少奇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一九三九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并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九年经作者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这本著作，“文化大革命”中同刘少奇一起受到错误的批判。刘少奇，参见本册第90页注〔1〕。

〔2〕《〈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力、关锋起草，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修改，作为《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和五月八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曾多次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五月二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五月五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五月七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四、五是毛泽东在送审稿中加写的两段话。

〔3〕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4〕 即本篇四。

〔5〕《礼运》是战国时期至西汉初期儒家思想及礼仪著作选集《礼记》中的一篇，其中所讲的“大同”是指一种“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6〕 陶潜，即陶渊明，东晋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祸乱的“世外桃源”。

〔7〕 康有为，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他的《大同书》将《礼运》中的“大同”说与儒家公羊学派的“三世”说结合起来，提出自己的“大同”思想，认为“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对张香山[1]关于《矛盾论》中一段引文翻译问题的请示报告[2]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

如何处理，请康〔3〕、王、关三同志酌定。

毛　泽　东

五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张香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

〔2〕 张香山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写报告说，主席《矛盾论》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这段话没有引全，因此主席用了删节号。我们原来的英译本在英国出版时，照主席引文译出。但这次在北京出版再译本时，英方认为这样有问题，译者给补全了。这样，如果中英文对读，就会发现中英文不符。为避免这一问题，我们建议应照主席引用的文字翻译，不必补足。但外文出版局专家艾德勒来信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样处理曲解了恩格斯的原意，并说恩格斯的这段话原是指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指矛

盾的普遍性。艾的理解可能是正确的。问题是主席引用这段话，乃是为了说明矛盾的普遍性的，因此即使引全了，也还不能解决艾所说的问题。对此应如何处理，请你们批示。在后来出版的英文再译本中，是按恩格斯这段话的全文翻译的。如照此译成中文，应为："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3页）

〔3〕 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在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林彪、恩来〔1〕、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2〕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

毛　泽　东

五月七日

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54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3〕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4〕诸同志共同商处。

毛泽东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

周恩来。

〔2〕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给济南军区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主要表现是：一、到处张贴、散发攻击解放军的大字报、标语、传单，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二、冲击军事机关，围攻、绑架部队人员。三、侮辱、殴打和斗争解放军干部、战士。以上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使许多军分区、县市武装部无法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各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有不少处于瘫痪状态。这种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3〕“八·一五”是当时重庆大学的一个群众造反组织。

〔4〕梁，指梁兴初，张，指张国华，甘，指甘渭汉，韦，指韦杰，当时分别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第一政委、第四政委和副司令员。

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林彪〔1〕同志：

此件〔2〕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以上，请酌定。

毛　泽　东

五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指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说，最近，我们对派出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一千七百多名干部，分两批进行了集训（第一期十天，第二期八天），并通过集训

调整了一些干部。这次集训的主要经验是：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针对干部的活思想，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中央军委转发到团级以上党委。

关于发表《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材料等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文革小组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如准备发表，事前要找炮五师、谭厚兰、李庆林〔2〕等同志核对属实，不妥处加以修改，然后发表。又，四川那个文件〔3〕，关系重大，如何修改的，请告知为盼！

毛　泽　东

五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七〇期上。这期简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的材料。材料说，北京军区炮五师在北京师范大学搞军训期间，“坚决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对保守势力和中间派做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瓦解了保守组织，提高了中间派的阶级觉悟，壮大和巩固了左派队

伍”。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材料，同时还发表了题为《军政训练好》的社论。

〔2〕 谭厚兰，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掌权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公社”的负责人。李庆林，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另一造反派组织“井冈山造反兵团”的负责人。

〔3〕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对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宣传工作意见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

退陈伯达同志：

提碰头会讨论决定。如大家同意，我不反对。

毛　泽　东

五月九日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送审的意见稿上。意见稿建议，五月份的宣传工作以《讲话》为中心，组织演出、宣传、纪念活动。具体内容如下：（一）各报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自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训传》以来毛主席有关文学艺术的重要指示。（二）发表纪念《讲话》的社论和文章，有重点地组织几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并组织工农兵群众座谈。（三）发表并出版革命样板戏的剧本和其他的革命文艺创作。组织革命文艺工作者写些学习《讲话》的心

得体会，大力宣传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四）发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和江青一九六四年在全国革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五）五月二十三日召开纪念《讲话》的群众大会。（六）五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组织庆祝活动，演出革命样板戏和革命电影，并广泛开展群众性业余文艺演出活动。（七）将一批毒草影片拿出放映，供批判之用。

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

一

此件送总理[2]阅后，交文革小组一阅，退林彪[3]同志存。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毛　泽　东

五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这是张春桥、姚文元[4]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工人们表现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转报的一封署名为“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的批语。这封写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信中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我们天天挨骂，任人逮捕、扣压，干部家属也被殴打、辱骂，军区的干部子弟也天天挨打。我们支持的工厂、企业单位，都一个个被砸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从他们夺权以来的一系列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在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而是按什么“王效禹思想”办事。也许是我们解放军未跟着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怀恨在心，欺骗中央，掀起了这股反对解放军的大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还要不要解放军，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贫下中农，要不要广大党团员？这到底是在对谁专政，是谁在专政？刘伯承在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转报这封信时写道：“昨廿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加了着重号，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王效禹，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一九七〇年六月被免职。

〔2〕　总理，指周恩来。

〔3〕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4〕　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对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支左工作中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林彪、恩来〔1〕同志：

此件〔2〕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一七八期上登载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材料中说，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一）认为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承认围绕

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二）说济南军区一些干部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错误议论”。（三）说济南军区机关正在积极准备“打官司”，赴京告状。（四）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至今没有揭发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问题。（五）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

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月）

一

照办。

毛　泽　东

五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二

林彪、恩来[2]同志：

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3]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

毛　泽　东

五月十四日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退林彪同志：

此件已阅，很好，照办。

毛　泽　东

七月三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批语。意见中说，“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本篇二是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党委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十二时给中共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个电报说，兰州地区当前的文化革命形势仍然是大好的，一些左派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这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领导干部已表态支持“红三司”，因此“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我们认为，应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委会。军区党委经过讨论，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红三司”，请速指示。本篇三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七月二十九日转发《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的通知和纪要的批语。这个纪要是根据毛泽东五月十四日批示，将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冼恒汉、詹

大南等二十多名负责人和胡继宗召到北京，就甘肃问题进行座谈后产生的。纪要指出，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 张，指张达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指冼恒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詹大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甘肃省军区司令员。

在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1]来信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

一

印《快报》[2]，文革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3]，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

毛　泽　东

五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秦厚德，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通信总站干部，一九六六年九月被免职后安排转业，因地方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未被接收。一九六七年三月参加济南军区司令部的支左工作。

〔2〕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

〔3〕 秦厚德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写给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并转毛泽东等的信中说：我于三月四日参加了军区的支左工作，根据一个多月的亲身体验和所了解的情况，感到驻济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在二月十日以前是完全正确的，自二月十日以后进入工厂、院校至今，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二、搞"合二而一"，以保守派组织为核心去联合革命群众组织，如革命群众组织不同意时，即认为是搞分裂主义，破坏大联合。三、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四、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使人见了害怕。五、省革委会与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有分歧，部队支左的同志对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意见，对省革委会其他成员的讲话更是对立，近来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六、部队的同志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等革命组织十分对立，这种对立现已公开化，双方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断游行示威，有时还发生武斗。七、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成了保守派告状的地方，省革委会成了革命派告状的地方。

对北京市革委会重要通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

照办。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送审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的批语。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通过的这个通告的主要内容是：一、革命群众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争取革命和生产双丰收。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调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武斗。四、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指示。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五、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秩序、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六、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

串连的通知。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应当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同样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地。五月十四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了这个通告。

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一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1〕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二

恩来、林彪〔2〕、中央碰头会阅发。

三

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毛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广东省军管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五月十二日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说，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

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湖南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三），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2〕 恩来，即周恩来。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一

即退王力[2]同志。

改了一点，请小组[3]酌定。

毛　泽　东

五月十八日上午二时半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

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根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三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

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根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伟大的历史文件》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开发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而写的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五月十七日送审的文章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三是在送审稿末尾加写的一段话。

〔2〕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3〕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摘要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林彪、恩来[2]同志，并告文革小组：

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一三一期上。这期快报登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等五月十日与“广州工联”八位造反派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摘要。黄永胜在讲话中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关于江青不宜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毛　泽　东

五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关于我党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代表团成员组成问题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建议的我党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中，有江青的名字。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1]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一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中央军委

五月二十七日

二

林彪、恩来〔2〕同志阅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给成都军区并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这个电报说，近几天，军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　泽　东

五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2）上。这期《要事汇报》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二十二日晚，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1]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林彪、恩来[2]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 泽 东

五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决定（试行草案）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昨（廿七）日常委碰头会上通过这一决定（试行草案），现送上，请予审批。"决定（试行草案）指出："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或军

管小组，任命×××为军管会主任或军管小组长，×××、×××为副主任或副组长。”“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委）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统帅生产，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掀起生产的新高潮，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久，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这个决定（试行草案），对国务院一些部（委）陆续实行军事管制。

老干部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

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1〕

根据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发表的《要让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作者任立新）一文，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并写道："一切革命干部都要响应毛主席的这个伟大号召。"

对一封反映西安几个学校造反派讲阔气、讲排场等问题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文革小组各同志：

建议此件公开发表。是否妥当，请在常委碰头会上一议。发时宜写一按语。

毛　泽　东

六月廿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二三四期上。这期快报刊登了陕西师范大学文革筹委会景险峰等四人的来信。信中说，最近，西安有几个学校的造反派庆祝成立革命委员会，其规模之浩大，场面之豪华，实在令人惊讶。他们不是节约闹革命，而是大搞铺张浪费。西军电、西工大两校联合开庆祝大会，成立革委会，参加者达三十七万六千人，几乎是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参加人数的四倍，筹办大会花了近万元。冶院成立革委会，在讲排场、讲阔气方面比前者

更甚。一些中等专业学校也学起了“老大哥”的样子。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问题，它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若不予以纠正，是很危险的。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将这封信转发到各军区，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和群众组织。通知中说，中央认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充分认识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每个同志都面临着新的严峻的考验。必须懂得，当权以后，地位发生了变化，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滋长和发作，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灰尘也迎面扑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高度自觉，不断地用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武器，改造自己的思想，坚决抵制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一九六七年）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1〕

根据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按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和支工情况报告等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月）

一

1. 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2. 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3. 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二

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组织支工部队，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分别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和北京市化工三厂。本篇一是毛泽东在支工部队临行前所作的三点指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给毛泽东写来报喜信，汇报在支左部队的帮助下，该厂成立了革委会。十一月十三日，八三四一部队也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我们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后，坚决遵照主席在我们临行前所作的三点指示进行工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大力宣传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要斗私，批修"的号召，促进了该厂两派群众的大联合，组成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支工过程中，我们老老实实地做工人群众的小学生，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战斗，同他们交心，了解了很多情况，学习了很多东西。此外，还组织医疗小组，为职工及其家属看病近两千人次。本篇二是对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的来信和八三四一部队报告的批语。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将来信、报告和批语一起印发全国各地区、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等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十三日）

一

林彪、恩来[2]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毛　泽　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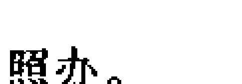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此事也请制止。

三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二八〇期上刊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材料写的批语。本篇二是对这期简报上刊登的一则简讯写的批语。这则简讯说：北京矿业学院某群众组织过去曾在北京印售未经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讲话，受到有关方面的制止。但是，他们最近又收集了毛主席的许多没有公开发表的讲话材料，派人赴长沙编印。希望中央制止。本篇三是对周恩来七月十三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指示稿的批语。中央指示稿将毛泽东七月五日的批语（即本篇一）转发各地，指出："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

林彪、恩来[2]同志：

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

毛　泽　东

七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五十五号上。这期摘抄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七月四日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对两种《毛主席论教育》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十二月六日）

一

退陈伯达同志：

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

毛　泽　东

七月六日

二

陈伯达同志：

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

毛　泽　东

七月六日

三

陈伯达同志：

作了一点修改〔2〕。请同志们看一遍，如认为可以，即可印发。

毛　泽　东

十二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九六七年六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批语。这本小册子分为九个部分：一、政治挂帅；二、阶级斗争；三、教育目的；四、教学革命；五、教学内容；六、教学方法；七、师生关系；八、办学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九、学校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将这本小册子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政治研究室编出《毛主席论教育》小册子，打算发给大家，作为正面教材，作为教学制度革命的指导方针，让大家讨论，结合调查研究，以便提出大、中、小学校的教学改革的初步方案，供中央考虑。"本篇二写在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一九六七年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小册子上。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十五个部分：一、党的领导；二、教育方针；三、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四、教育要革命；五、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六、群众路线；七、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八、教学方法；九、知识分子的改造；十、青年；十一、群众办学，勤俭办学；十二、理

论联系实际；十三、论知识；十四、破除迷信；十五、批判继承。后面还附有《陈伯达、戚本禹同志与北京大学革命师生代表座谈有关教育改革问题》的材料。本篇三是对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义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批语。该书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共收录了毛泽东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六七年间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五十余条，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知，将此书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各地大中小学校。

〔2〕 毛泽东对《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一、第九页摘录了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一段讲话，其中讲到，"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毛泽东在文中"我这些材料"后面加括号写了一个注："当时印了一批古今中外发明家的材料"。二、第十一页摘录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大学，是个吹鼓手"一句改为："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在"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一句后面，加写了一句："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在"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一句后，加了"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在讲到经学时删了以下一段话："如佛经，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字太多，很难读完。唐玄奘译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金刚经》内容提要，只有几百字，比较好读。"三、第十三页摘录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其中

讲到："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毛泽东审阅时在这后面删去了以下一段话："《论持久战》也是这样写出来的。《矛盾论》写了几个星期，白天黑夜写，准备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写好了就不要讲了。"四、第十四页摘录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以下一段话："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生，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五、第十六页摘录了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审阅时，在"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一段话后面，加了一句："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除了上述几处外，毛泽东在这本书的个别地方，还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毛泽东等悼念阮志清[1]逝世的唁电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

胡志明[2]主席同志：

惊悉阮志清同志突然因病逝世，至为哀痛。阮志清同志是您的、也是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也是世界革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好战友。他为越南的革命事业，为中越两国、两党、两军的团结战斗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但是，他的光辉的榜样和影响是永远不会消逝的，是会继续发扬光大的。务望节哀，保重您的身体健康。

毛泽东　林　彪[3]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

根据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阮志清，原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因病逝世，享年五十三岁。

〔2〕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3〕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对总参、总政关于执行林彪[1]指示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2]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退林彪同志。

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3]。

毛　泽　东

七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的这个通知稿写道：林副主席于六月二十八日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七月十日，林彪将通知稿转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写了这个批语。

〔3〕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参见本册第369页注〔1〕。

对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通知稿[1]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一

照办。

二

不宜称为坏人。[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戚本禹起草的，主要内容是：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武器一律收回。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

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律由挑动者负责。五、从本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

〔2〕 中共中央指示稿的开头有一段话，说到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的“坏人”一词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并写了这个批语。

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

林、周〔1〕、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

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

毛　泽　东

七月二十五日十七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2〕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3〕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

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4〕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　　央

七月二十五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和所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公告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毛主席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这一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陈再道等人“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公告于七月二十六日公开张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过长期调查，证明‘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

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〇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王任重、陈再道同志是‘七·二〇事件’的‘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〇一部队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诬蔑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这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被打成‘一小撮坏头头’，不少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属被诬蔑为‘百匪家属’；甚至连同情八二〇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〇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〇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被打伤、打死的人员，应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处理好抚恤等遗留问题。”

〔3〕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

〔4〕 “百万雄师”，是当时武汉市的一个群众组织。

对《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

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1〕。

毛　泽　东

七月廿五日下午十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

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转送的这封信稿上；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信稿中加写的一段话。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这封信。

〔2〕 即本篇二。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

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2〕，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

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

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

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本篇是毛泽东视察这些地区时谈话要点的记录整理稿。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整理稿转发到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2〕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明路线使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都遭受十分严重的损失。博古，即秦邦宪，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间，担任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推行王明“左”倾

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被撤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一九三七年先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三八年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张闻天，即洛甫，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军事路线，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他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对张际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问题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2]素描的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3]的道路。

中央文革小组传阅，存办公厅秘书局。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八月出版的《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上。张际春在信中谈了几年来一些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进行人体素描的情况，申诉了他的一贯看法，以及他对毛泽东过去有关批示的认识和理解。他说，要画人体，不写实、不用模特儿当然不行。但使用模特儿，似不一定要从社会上专门雇请，可考虑用别的办法代替。信中最后写道："我没有说'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的话。我是主张要模特儿的，只是就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一些新意见。"在"文化大革

命”中，张际春受到错误批判，于一九六八年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昭雪。

〔2〕 徐悲鸿，著名画家，擅长油画、中国画，尤精素描。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3〕 齐白石，著名画家、篆刻家、书法家，尤精国画。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关于《毛选》正文中的一些人名在翻译时不宜删改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有些注解似可删去，正文不改。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张香山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王力、关锋的报告上。报告说："今年一、二月间《毛泽东选集》各翻译组同志，根据文化大革命中发现的问题，纷纷提出，要求修改或删去《选集》正文、题解、注释中出现的一些人名。"经请示主席后，"决定仍照原文翻译（当时中央同意删除刘少奇的两段话和《历史问题决议案》)"。最近，我们曾请示删去"王明同志"的"同志"两字，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同意。同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翻译组同志又再一次提出，是否应删去刘少奇等十二人的名字，或把他

们后面的“同志”两字删去。由于这个问题极为重大，而且涉及到要修改正文，故请你们转报中央批示。

对中央关于湖南问题若干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七日）

一

改了一点，其余都好。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已阅，同意。

毛　泽　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三

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

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分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共四条，主要是：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省革委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中央决定稿曾两次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二是分别对这两次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这个决定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决定。

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一

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引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

毛　泽　东

十一日下午五时

二

退陈伯达、江青照办。

毛　泽　东

八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二均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送审的这篇《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上。这篇文章后来分别发表在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和八月十七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

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照办。

试办第一批以后，再定第二批的范围和办法，到那时可能要作一些改变。

毛　泽　东

八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送审的意见稿上。意见稿中说，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办好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训练班的指示，我们设想训练的方法，主要采取整风和“四大”的形式，阅读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其他有关材料，请中央负责同志讲话，请革命左派介绍斗争经验，大、中、小会议相结合，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训练步骤可配合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步骤分四批进行，每批暂定两个月，可交错进行。训练工作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直接领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陈伯达协助进行。各省的训练班都要组织一个小的领导班子，挑选一批军队的造反派和地方上的红卫兵参加工作。八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文件。

对《评陶铸[1]的两本书》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月）

一

文元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题目似可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小题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简略，宜于加以发挥。但文章已不短，再加或显得太长。究应如何，可与你的写作班子同志们一商，他们可能提出些好的意见。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日

二

姚文元同志：

看过，极好。我只改了几个字，加了一段话[3]，是否妥当，请酌定。建议在北京发表，前一天广播，以便同北京在同一天在全国各报发表。还要先送北京[4]，在中央文

革，中央碰头会，以三四天时间加以讨论。如有好的意见，加以吸收。

毛　泽　东

八月廿八日上午八时

还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5]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又及

三

文元同志：

已看过，除个别修改外，均照办。

毛　泽　东

九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四

根据春桥同志意见，此段以删去为宜。[6]

五

不要用黑体字，应与上下文一律。[7]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六

这个反动组织〔8〕，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根据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 陶铸，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七年初，因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攻击和诬陷而被打倒。他的两部著作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出版）、《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也因此而受到错误的批判。一九六九年底，陶铸被迫害致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为陶铸举行追悼会，中央副主席陈云在悼词中指出："陶铸同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2〕 《评陶铸的两本书》原题为《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动本质》，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的写作班子炮制的。本篇一写在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送审稿上；本篇二写在姚文元八月二十六日送审稿上；本篇三写在姚文元九月三日

送审稿上；本篇四、五是在姚文元九月三日送审稿中写的两个批语；本篇六是在姚文元八月二十六日送审稿中加写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等报刊。

〔3〕 即本篇六。

〔4〕 毛泽东当时在上海。

〔5〕 刘，指刘少奇。参见本册第90页注〔1〕。

〔6〕 姚文元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送审稿中原有以下一段话："'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不通的。知识分子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根据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分析，只能从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来判断其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左派、中间派或右派。你咒骂这种科学分析是'肃杀之气'也好，杀肃之气也好，对立阶级的客观存在是你反革命黑话抹杀不了的。"九月三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请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杨成武（当时陪同毛泽东在上海视察）转报毛泽东："姚文元批陶的文章中，有一段批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第八页），这个问题涉及总理同陆定一的争论，是否在此文中不提这个问题，请主席考虑。"毛泽东在姚文元的送审稿中删去了这段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7〕 姚文元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送审稿中，将毛泽东八月二十八日加写的一段话（即本篇六）用黑体字排印。对此，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这段话未用黑体字排印。

〔8〕 指当时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

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但到一九六八年，又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指责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情况混乱不清，最后不了了之。

对《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1]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很好，照发。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发的这个文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国国防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为着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更亲密地团结起来，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文件要求各方必须根据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新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一系列指导思想。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抗美救国战争中，消灭了美国侵略者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威风，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中国人民热烈地祝贺

兄弟的越南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遭到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他们所面临的是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战争。越南人民坚强不屈、英勇奋战，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使美国侵略者陷入灭顶之灾，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国家单独抗击和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典范。越南人民的胜利向全世界证明，美帝国主义这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是完全能够被打败的。

美帝国主义已经陷入越南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它还要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当前，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并且继续玩弄和谈阴谋，妄图挽救它的失败。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也在加紧同美帝国主义勾结，力图破坏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但是，英雄的越南人民是吓不倒、骗不了的。正如胡志明主席所指出的，越南人民“团结一致，不怕艰苦、牺牲，坚决战斗到彻底胜利”。我们相信，越南人民必将粉碎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克服各种困难，将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越南人民。

中国人民一向把越南人民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决心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是更加强大了，更有力量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中国人民决心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在一起，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

根据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命令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总理：

已阅，照办。

毛　泽　东

九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稿上。命令稿指出，为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月六日通令和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特再次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

物资。三、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发给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四、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命令。

在戚本禹检讨信[1]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2]二同志。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一九六八年一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

三年十一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2〕 关，指关锋，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指王力，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八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被开除党籍，免予起诉。

对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记录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十月十一日）

一

已阅，作了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这篇话讲得好，应当发下去。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

二

林彪同志：

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第二遍，又作一点小的修改，请你酌定。请转恩来、伯达、康生〔2〕诸同志一阅。用中央名义写一个报头，即可发下去。〔3〕

毛　泽　东

十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北伐战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在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的讲话中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二是解放军的力量。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都不希望他垮下去。要不垮，办法有三条：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第二，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调查研究，听取两方面意见。第三，现在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而要以是否拥护文化大革命、是否拥护毛主席作为划分的根据。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靠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就要多请示主席、中央。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挂帅，学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不要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后退。对林彪的这个讲话记录稿，毛泽东先后作过两次批示（即本篇一、二）和修改。他加写的文字，即本篇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部分；他删去的文字，除点名批判的几处人名外，还在林彪讲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国

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之后，删去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一句。此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2〕 恩来，即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3〕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指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讲话很重要。这篇讲话，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

对《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照办。

九月二十三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紧急通知稿上。通知稿指出，在北京和外地串连的学生和上访人员，应根据中央多次指示精神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迅速返回原地、原单位欢度国庆节，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促进本单位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北京和各地的接待机构、联络机构从九月二十八日起一律撤销。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这个通知。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三十日）

一

可用。

毛　泽　东

九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应引几段列宁的话，应多次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即退陈伯达同志照办。

修改得很好〔2〕。在第三页，我作了一点修改〔3〕，请

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三十日十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篇社论稿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而写的。本篇一、二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凌晨送审的社论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陈伯达九月三十日凌晨送审的社论修改稿的批语。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五期。

〔2〕　根据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批示的意见（见本篇二），陈伯达九月三十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引用了列宁以下两段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同时还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以下一段话：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此外，还有四处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3〕 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讲的两段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对其中的第二段话，毛泽东作了文字上的修改，修改后的这段话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对林彪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1]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退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毛　泽　东

九月廿九日下午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的这个讲话稿，是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张春桥起草，经周恩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以及小组其他成员讨论修改而成的。后发表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

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

林彪、恩来[2]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以什么机关为出版单位的问题，请在一次会议上商定。[3]

毛　泽　东

十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为了适应当前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需要，我们选编了批判资料——《刘少奇言论》。"报告中讲到，关于出版单位，"有几个方案，请择定：（一）中央文革办事组；（二）中央办公厅；（三）红旗杂志社；（四）人民出版社"。报告附送了关于此书的《出版说明》。毛泽东审阅时，把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了这个批语。刘少奇，参见本册第90页注〔1〕。邓小平，参见本册第149页注〔16〕。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刘少奇言论》后来以“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名义出版，《出版说明》中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字。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1〕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载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注　释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发出的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通知还指出："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中，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对青海省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和中央复电稿的修改[1]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一

中央文革各同志：

此件应讨论一下，给以答复，同时转发各地照办。

毛　泽　东

十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应当这样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林彪、恩来〔2〕、中央文革各同志：

电报改了一下，请你们再开一次会，如能通过，即可发出。

毛　泽　东

十月廿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四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　共　中　央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给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上。电报中说："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如过去作了组织处理的党团员，有的要求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划了横线，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本篇三写在周恩来、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并报林彪的报告上。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这个报告说："主席批示小组应该讨论青海核心小组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小组在二十六日讨论了，但没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思想，拟出通报，而竟节外生枝，搞烦琐主义，向青海通一个电话，又不先向主席请示，完全擅作主张。这个错误，完全是由我们负责的。类似这种错误，已有好几次。谨此请主席严厉批评或处分。""附电话原稿。这个电话已经按照主席指示通知撤销。"电话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于十月二十六日三时打给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刘贤权的。张春桥在电话中说："中央认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以照你们来电，过党的组织生活。但是，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

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输进新的血液，等等。请你们讨论一下，根据不同意见，整理出一个简要的材料，送给中央，并由你或派负责同志到北京同我们一起讨论，报中央决定后再正式答复你们。”本篇是对陈伯达十月二十七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当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即发出了这个电报。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对聂荣臻[1]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聂荣臻同志：

此件[2]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

毛　泽　东

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2〕　指聂荣臻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提出：一、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合理调整改组，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若干个研究院。二、积极解决国防科研单位的试制加工力量，缩短研制周期。三、认真做好军管工作，有步骤地进行接管和调整，条件成熟一个就接管和组建一个，争取明年上半年基本上都组建起来。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聂荣臻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

给李志芬的题词[1]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好好学习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李志芬，当时是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毛泽东的这个题词，写在她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上。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月）

一

内件不看了。[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3]

毛　泽　东

十一月三日下午五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这篇文章，是为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而写的，发表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一月二十三日

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六期。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十月二十七日送审第三次稿的信封上；本篇二写在陈伯达、姚文元十一月三日送审第六次稿的信封上。

〔2〕 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将编辑部文章第三次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前送社论稿，字体太小。现送上大字本一份，请审阅。"对这次送审稿，毛泽东未作任何修改。

〔3〕 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将编辑部文章第六次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经充分引了。文章对苏修的打击，有一定作用。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修改。"这里说的"关于主席思想六条"，指送审稿中概括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共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

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

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原文是黑体字，即“作了新的整理”的毛泽东有关论述。在这次送审稿中，还大量引用了列宁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对这次送审稿中说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字，此外未再作任何文字的修改。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1〕

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注　释

〔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方案》为题，加编者按发表了《同济大学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北京林学院取消教研室，组织专业连队领导教学和教改》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改组对改革考试、升留级和招生的设想》。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1〕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谈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讲的一段话。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社论中，引用了这段话。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转发陈永贵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谈话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

伯达[2]同志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到农村。请酌办。

毛　泽　东

十一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五二九〇号上。这期快报登载了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永贵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谈话，共五个部分。一、“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狠批猛斗，批倒批臭，肃清流毒”。二、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要打倒一切就不会打倒敌人，反而会扩大敌人的力量，破坏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三、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大队、生

产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方向，帮助下面解决问题。四、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必须坚决镇压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五、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转发了陈永贵的谈话。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对云南省各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简报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文革小组及碰头会各同志：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此件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请你们讨论、酌定。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给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我省各专（州）县正在贯彻落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号召。一个多月来，各地部队党委、各级军管会、支左机构把这一工作列为重点，加强了领导。据不完全统计，至十月底，已办和在办的各种形式学习班共三百五十六个，参加学习一万三千多人。这批学习班的主要收获有：一、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二、进一

步认识到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不同程度地检查和克服了在干部问题上的“私”字。三、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它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各地对学习班正在总结经验。滇南地区一些学习班总结的初步体会是：一、指导思想必须明确。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当前运动中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二、必须始终以毛主席的“老五篇”和最新指示为主要学习内容，带着大联合、干部问题和三结合等方面的问题，反复认真地学，不断加深领会，对照检查。要抓大节，抓大方向，防止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三、要掌握重点。结合实际，扎扎实实解决一两个关键问题。四、贯彻群众路线的方针，始终要应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指责别人，不强加于人。五、加强领导。要同学员一道学习，把群众中先进萌芽的东西加以扶植培育，总结推广。

转发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的经验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

姚文元〔2〕同志：

江西工作的四条经验，似可转各地参考，请商各同志酌定。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编印的《快报》第五四一四号上登载的《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批语。文章说，江西省革筹小组在贯彻

执行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若干决定的过程中，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注意工作方法。其经验是：一、围绕中心抓活的典型，用群众去教育群众。在运动发展到关键时刻，采取了用典型带动一般的方法。二、深入群众，听取意见，抓群众的活思想。三、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结合中心任务，到工矿、农村做宣传工作，并抓革命促生产。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在这一句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四、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促进自己革命化。

〔2〕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1]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看过，可用。所引材料，要核证属实。

毛　泽　东

十一月二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第十六期。

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林彪、恩来[2]同志阅。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3]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毛　泽　东

十一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这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编印的《快报》第五五一〇期上登载的《南萍和陈励耘同志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材料的批语。材料中说，十一月十六日，浙江省军管会讨论革命大联合问题时，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是否联合“红暴”（浙江大学群众组织）问题上发生分歧。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来，就应该联合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陈励耘认为，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组织犯

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将这篇材料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我觉得两种意见中，似以南萍一方的意见较为符合主席的路线与政策；对‘红暴’派采取一概排斥、拒绝联合的方针，则是不利的。”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 “百万雄师”，是武汉市的一个群众组织。在一九六七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组织”。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为“百万雄师”这个群众组织作了平反。参见本册第381页注〔2〕。

对《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1]稿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一

删掉了几句。〔2〕

请林彪〔3〕同志阅后，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4〕。

二

不要这两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5〕

毛　泽　东

十一月廿五日下午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通报汇集了中共中央《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下达后第一批反映的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九大”最根本的任务，以毛泽东思想建党和修改党纲党章，总结路线斗争经验和开展路线斗争教育，整顿党的组织和改革领导机构，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条件和标准，“九大”的开会时间、规模、代表产生和开会方法等几个方面。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将这个通报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遵照主席月初指示，康生、文元两同志收集和阅读了各地、各单位报来意见，起草了这一通报，并经二十晚小组扩大碰头会上讨论和修改通过。现送上修改后重印稿，请予审阅批示。”这个通报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发。

〔2〕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报稿时，作了两处删改：一、在关于“九大”的最根本任务部分，删去了“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等语，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二、在这一部分，还删去了“‘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一句中“和好学生”四个字。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主要是在关于整顿党的组织、改革领导机构部分，将“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队伍，成为能够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一句改为：“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队伍，成为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3〕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4〕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

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5〕 这个批语写在林彪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整理的电话记录稿上。记录稿说，“林彪同志电话交待：他主张把第二页第三段全文删去，或者改写得轻淡一些为好。他认为，原文对他的评价太高。”中共中央通报稿第二页第三段的全文是：“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林彪看到的是毛泽东审改过的稿子，这一段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后面“和好学生”四个字已被毛泽东删去。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三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三周年伟大节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一贯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通过武装斗争，打败了法西斯帝国主义，建立起人民的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解放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无

产阶级专政，坚持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自力更生的方针，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和颠覆活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近几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措施，在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深入地开展了革命化运动，为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了新的经验。这个革命化运动，不仅对于保证阿尔巴尼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为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和人民，一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和坚持革命的外交路线，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这种反对帝国主义的鲜明立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博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高度赞扬。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和人民，始终站在反修斗争的前列，坚决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铁托〔1〕叛徒集团进行了尖锐的、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将永远铭记阿尔巴尼亚在这场关系人类命运的反修斗争中所建立的不朽的历史功勋。

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欧洲坚强的社会主义

堡垒。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是真正的同志和战友的关系。这种关系一年比一年更加亲密、更加深厚。我们愿借此机会，向你们表示我们的信念：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什么时候，中国人民永远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共同前进，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

对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一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当前农村形势大好。只有一小部分受灾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送审的中央指示稿

上；本篇二是对指示稿中第一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一九六七年）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1〕

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中，用黑体字发表了这句话。

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等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林、周[2]、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庆祝毛泽东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问题向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报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报告中说，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在韶山建造毛主席塑像和修建通往韶山的铁路这两项工程即将竣工，广大群众要求在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省革筹小组经研究，同意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隆重庆祝活动”。特请示以下三个问题：（一）请“毛主席为‘韶山车站’（或‘韶山站’）题字”，“请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为毛主席塑像落成题词，并请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派人来韶山参加庆祝活动”。（二）关于大会名称，有两种意见。（1）“大会名称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2）“大会名称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会上举行塑像落成及通车典礼。”“我们考虑，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好。”（三）“在这一天，韶山举行约五万人的庆祝大会，同时在长沙、株洲、湘潭等车站组织庆祝活动。我们除组织省报和有关宣传部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外，希望新影能派人来摄制新闻纪录片。”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语和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报告

〔2〕 林，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在《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在第三条内去掉了几个不妥当的形容词。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周恩来等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决定稿第二部分第三条中写道："努力建立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的领导核心，逐步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新闻队伍。"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三处"无限"和两处"非常"，并写了这个批语。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这个决定。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阮友寿[1]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战斗中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你们打得好！你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打得走投无路，狼狈不堪，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

你们的胜利又一次表明，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越南人民在伟大领袖胡志明[2]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而革命人民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困难都阻

挡不住革命人民的前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深信，越南人民坚持持久战争，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兄弟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可以相信，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毛　泽　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阮友寿，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2〕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对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姚文元[1]同志：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去掉了几个浮夸的形容词[2]，请你们酌定。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九日上午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元旦社论，已经碰头会讨论通过（谈了两次），现送上，是否妥当，请审阅批示！"这篇社论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两报一刊发表。

〔2〕 在姚文元送审的社论稿上，毛泽东删去了"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

疆”一句中“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后一个“万寿无疆”；删去了“用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语中“最高水平的”五个字。

对成立江西省革委会的新闻稿和社论稿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

退姚文元[1]同志：

两件[2]可用。

在两件中各去掉了几句不大妥当的话[3]。

毛　泽　东

一月六日下午三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2〕　指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送审的关于江西省革委会成立的新华社新闻稿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这两篇稿子均发表在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3〕　在新华社新闻稿中，毛泽东删去了“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中，毛泽东删去了“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并将“他们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句中的“步步”两字删去。

对北京大学一学生反映"伍豪启事"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此事早已弄清[2]，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　泽　东

一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在一九三二年的《国闻周报》、《申报》、《时事新报》上发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毛泽东的批语，写在这封来信的摘要上。伍豪，周恩来的别名。

〔2〕　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主席毛泽东署名的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而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报馆对于伍豪等的更正启事（照他们的章程纳广告费的），竟完全拒绝登载。这

些报馆显然是利用反革命的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帝国主义工部局的庇护，而积极实行这种危害革命反对工农兵士群众，并且间接帮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民众革命的行为。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最高革命法庭根据这个理由，宣布时事新报时报申报以及一切登载所谓'伍豪等'的启事而又拒绝登载更正启事的报馆总经理的死刑!"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江青曾把南开大学红卫兵送来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报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为此，他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写信报送毛泽东。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毛泽东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报告[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

康生〔2〕同志：

此件请考虑可否转发各地，引起注意。请与碰头会各同志一商。

毛　泽　东

一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黑龙江省革委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送审的这个报告说，全省各级革委会充分依靠和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积极开展深挖叛徒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初步发现，叛徒特务的线索，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有的在中央干校、北京公安部门，有的混入了军事机关。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一九六八年）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1〕

根据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中在“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对周恩来等关于采取措施制止破坏铁路问题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二月）

完全同意。

退总理办，并告林彪〔2〕同志。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为报送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反映了徐州等地铁路遭到破坏的严重情况，指出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目前必须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在今晚提前实行。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

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江西省军区教育部队经验批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

一

送林、周[2]再阅。加了一段，请酌定。

毛 泽 东

二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过错误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有成绩的要宣扬他们的成绩，把他们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当然，首先要使自己

弄正确。如果自己有错误还没有改正，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周恩来等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给毛泽东、林彪写报告说："遵照主席批示，碰头会于今（九日）晚通过代中央起草的转发《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的批示，现送上，请予审批。"中央批示稿中指出，江西省军区党委"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使一些在支左中曾一度犯了错误的部队，在提高认识、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到新的地区担负支左任务，经受锻炼，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收效很好"。"中央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为部队改正错误、立新功创造了条件。"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二。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省军区、各军下发了这个批示。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对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二月）

在第六条的一句作了修改，请酌。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四日送审的中央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紧急通知稿上。通知稿共十一条，其中第六条讲到："在一个单位因为派别斗争分裂成两个生产领导班子、两套财务会计、两个金库、两个银行帐户的，必须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二月底以前迅速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否则，即由上级派军管人员或由上级革委会（革筹小组）、军管会派人来掌握生产和业务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一条中的"二月底以前"改为"文到一个月内"。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这个紧急通知，注明可以在一切基层单位宣读，在内部张贴。

对反映欧阳毅情况来信[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

林彪[2]同志：

此件请你看看，是否交成武他们查明处理。

毛　泽　东

三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原副政委欧阳毅的妻子陈民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炮兵机关斗争欧阳毅的情况。信中说，最近对欧阳毅的批斗更甚，武斗体罚严重，人已不像样子，恳求主席及中央首长能急速挽救他的生命，给他以活动自由。信中还说，欧阳毅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他绝不是坏人，恳请中央能详细调查他的问题。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他批示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请遵照主席批示，认真查明处理，俟有结果，盼告。"

对香港《大公报》文章《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日子》[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

林彪、恩来〔2〕、中央文革各同志阅。

毛　泽　东

三月廿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结论不一定对，还是会打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香港《大公报》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刊载的这篇文章，介绍了资本主义世界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的情况，认为当前西方的金融恐慌，很有些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大恐慌的模样了。而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和转嫁危机，通常是以战争寻找它们的出路的。文章最后说："从四十年前看现在的局面，说相同也相同，说不同也不同。

西方经济大恐慌山雨欲来，但是，它们是否能够从大规模的战争上寻找出路，却大有疑问。这是因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新中国屹立在东亚大陆上，成为世界灯塔，任何侵略者妄想碰上一碰，势必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而全世界的大好革命形势，尤其是美军已在越南一败涂地的事实，也使美帝国主义有所忌惮。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边吵边打，今后势将继续；但是，它们要是敢向全面战争的道路迈进，妄图借此解救危机，那么，它们彻底舒服的日子，必将更加提早来到！”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革命委员会好》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

一

等几天，加以修改，即可发表。

毛　泽　东

三月廿五日

二

照发。

在第2页上有一点修改〔2〕。

毛　泽　东

三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

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把毛主席总结群众的经验以后所提出的这三个方面在组织上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稿上。陈伯达、姚文元在送审稿上写道："送上社论一篇。其中引用了您的最新指示。是否妥当，请审阅批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见本册第477页《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之二。本篇二写在陈伯达、姚文元三月二十八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陈伯达、姚文元在这个送审稿上写道："这篇文章改了一下，可否即于最近发表，可以说明大好形势，可以起正面引导作用。"本篇三是对陈伯达、姚文元三月二十八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一期。

〔2〕 即本篇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部分。其中"'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一句，原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1]

（一九六八年）

一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二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根据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用黑体字引

用了这两段话。其中第一段话又在四月一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中发表，第二段话又在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中发表。

对康生关于审阅祝贺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电报问题的检讨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

注意到了，就好了。对外刊物和出版方面似有不少问题，可否请康生、伯达、文元[2]三同志主持召开一二次座谈会，研究改善办法。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送林、周[3]、伯达、文元同志亲启。

退康生。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一九

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写信说："中联部代中央起草的对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这个稿子我看过，而且经我批发送审的，我有责任。""读了主席对电文的修改和严肃的批语，我深自谴责，没有坚决贯彻执行主席多次的教导，又一次犯了错误，这是不能允许的。希望主席予以严厉的批评。今后起草对外文件定当严加注意，坚决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毛泽东对电文的修改，见本册第275页《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之（九）；毛泽东对电文的批语，见本册第287页注〔9〕。本篇一写在康生的这封检讨信上；本篇二写在这封检讨信的信封上。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文元，即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3〕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总理、伯达[2]同志：

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毛　泽　东

三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黑龙江省革委会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等的这个报告，总结了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进行的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一、在大专毕业生分配方向问题上，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把分配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使毕业生真正和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二、在毕业生思想教育问题上，组织各院校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带着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活学活用“老五篇”及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最新指示，并通过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准备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在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上，打破过去那种少数人冷冷清清坐在屋子里，大

搞神秘化的分配办法，在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及毕业生分配、调配工作机密的原则下，将有关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调配计划、个人志愿以及调配名单等，如实交给毕业生群众，然后用各种方式听取群众意见。四、在毕业生分配权力机构问题上，在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同时，建立并充分发挥“三结合”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的作用，保证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顺利进行。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黑龙江省革委会的这个报告。

〔2〕 总理，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退周[2]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3]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

毛　泽　东

四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给毛泽东等的请示报告中，在讲到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处，分别点了杨成武、张平化等人的名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三月三十日同意湖南省革筹小组这个请示报告的批语中，也点了张平化的名字。周恩来送审时在中央批语稿上加了一个注：“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湖南省革筹小组代表均主张点张平化的名，可否，请主席决定。”“第五页还有两处，请主席决定。”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三处点的人名，并写了这个批语。周恩来等将中央批语稿及其附件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时还写道，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听取和讨论湖南省革筹小组军、干、群代表共八人的汇报时，

曾提议结合龙书金同志，并任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四月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革筹小组的请示报告。

〔2〕 周，指周恩来。

〔3〕 杨成武，原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制造了诬陷迫害杨成武、余立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崇碧（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重大冤案，即"杨、余、傅事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一九七四年七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为他们彻底平反。张平化，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调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一九七一年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三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一段话

（一九六八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1〕

根据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中在“毛主席最近又深刻地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一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2]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3]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根据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

二

送林彪〔4〕同志阅，并请在碰头会宣读通过，可能还有修改之处。

毛　泽　东

四月十六日下午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发表在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本篇二是写在周恩来四月十六日中午送审的声明修改稿上的批语。

〔2〕　马丁·路德·金，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非暴力主义者。曾获一九六四年诺贝尔和平奖。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遭种族主义分子枪杀，由此触发美国一百多个城市的黑人抗暴斗争。

〔3〕　毛泽东这篇声明发表的时间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载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见本书第十册第335－337页。

〔4〕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对追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命令稿[1]等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四月）

有点修改。〔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门合，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四团二营副教导员。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在巴仓农场执行支左任务，用炸药装置土火箭驱云防雹，当炸药发生意外爆炸时，为保护在场的其他二十七人免受伤害，用身体扑在炸药上，英勇牺牲。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等报送了代拟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追授门合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的命令》稿及《门合同志英雄事迹的简要材料》。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这个命令。

〔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命令稿和中央军委办事组送审报告的修改，主要是将两件中的“忠于毛主席”改为“忠于人民忠于党”，将两件中的“无限忠于毛主席”改为“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

对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稿《乘胜前进》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可用。请考虑，用两报一刊的名义，是否更好些。应在碰头会读一次，征求意见。

毛　泽　东

四月廿九日下午三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上。这篇稿子后来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在五月一日发表。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一九六八年）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1〕

根据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社论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1〕

根据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这句话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接见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说的。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东北大地红烂熳——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同林彪[1]等人的一段谈话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2]

根据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等人的一段谈话。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1]送审稿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

可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为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而写的这篇文章，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晨送毛泽东审阅，五月十七日发表。

对电讯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

文元[2]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　泽　东

五月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注　释

〔1〕　新华社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编印的内参特刊《文化革命动向》上刊载的这篇电讯稿说，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在发动广大革命职工开展对敌斗争中，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他们的经验是：一、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

善于引导；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团结；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这个经验材料转发全国，要求参照执行。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国家出版局关于为北京新华印刷厂问题彻底平反的报告，指出“四人帮”一九六八年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炮制的那个假经验文件，应予否定；强加给该厂广大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所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应予平反昭雪。

〔2〕 文元，即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一段谈话[1]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

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还是你〔2〕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 这段话原载于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在全军深入传达坚决贯彻伟大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五月二十日对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指示的通知》。通知指出：毛泽东和林彪“五月二十日对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指示，已经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向全军指战员进行传达教育，这对于加强我军集中统一的领导，促进我军的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具有伟大的深远意义，对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光荣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

对《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最后一句口号可以去掉〔2〕，中间有几句自吹的话也去掉〔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北京革命工人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北京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北京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关于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这个声明发表在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2〕 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声明稿中最后一句口号“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声明稿中讲到：“当今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力量。”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一段中

“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及后面的文字都删去了。

机关工作人员要学点生产知识

（一九六八年五月）

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1〕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这段话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五月讲的，载于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转发的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纪要》。

在一份《外国专家情况反映》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六月八日）

同意在碰头会上讨论一次。

毛　泽　东

六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一九六八年六月四日编印的这份情况反映中说，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外国专家对他们的住所友谊宾馆的服务工作及没有人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有意见。有些意见确实是由于我们的工作跟不上和一些服务人员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引起的，有些是由于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不理解，有些则是对我进行攻击指责。六月七日，周恩来将这份材料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我建议：此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一议，然后再派人向凡有外国专家的地方去做工作，对中国工作人员必须派军管代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才有可能把关系搞好。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对“七·三”布告[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七月）

照办。

毛　泽　东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对国务院业务组一九六七年度粮食情况简报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

先念、富春同志：

此件已阅。所拟政策，望坚决实行。

毛　泽　东

七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国务院业务组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的这个简报说：目前我国粮食形势虽然越来越好，但总的说，粮食还是很不充裕的。因此，必须紧紧依靠和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继续努力，做好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一定要坚决、全面落实主席关于粮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注意搞好合理负担，清除同一生产队又购又销的现象，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要在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基础上，继续增加生产队的粮食储备；严格控制粮食销售，进一步减少农村销量，逐步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要注意解决仓储保管问题，要实行一般分散、适当集中的保管方针，努力避免损失，以利备战、备荒、为人民。七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写信将这个简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的批语写在他们的信上。

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一段谈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

根据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的一段谈话。《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而写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编者按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其中的引文作了修改，参见本册第509页注〔1〕。本篇即是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

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1]情况》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

林、周[2]及文革各同志：

请考虑可否把此件[3]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

毛　泽　东

七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的布告，见本册第502页注〔1〕。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关于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给中共中央等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月三日发出的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湖南驻军迅速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各单位很快形成了一个大学习、大宣传“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收到了日益明显的效果。经过宣传，有的人主动交出武器，

撤出工事，停止武斗。从实践中大家体会到，要落实布告，必须大张旗鼓地搞好宣传，从政治思想入手，充分发动群众。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这个报告转发各地，指出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地“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对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七月）

一

照发。

二

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您的提示，我们组织新华社、文汇报记者就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道路问题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加了一个编者按，引用了您的最新指示。现送上，请审阅、修改、批示！"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中引用的"最新指示"原文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改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本篇一是对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的调查报告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本篇二是在调查报告中所说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这句话后面加括号写的一条批注；本篇三是对调查报告中一句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此外，毛泽东还将编者按中"奉劝少数患有近视症而还不是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一句，改为"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将调查报告中"破除框框"改为"破除不适用的框框"；将"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劳动实践经验的高初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一句，改为"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发表在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对“七·二四”布告[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七月）

照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布告。布告说，最近以来，在陕西省的一些地方，连续发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对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

林、周[2]及文革各同志阅。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这样做很对。对犯罪者应当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毛　泽　东

七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给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的这个报告说，遵照中央、中央文革指示，我们于六月十一日至七月六日，举办了第一期释放学生犯学习班，收效很大。

我们的体会是：（一）对犯罪的青年学生，很需要做争取教育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二）从政治上启发觉悟入手，以自我教育为主，开展大摆、大颂、大批、大挖的“四大”活动，是促使他们自觉认罪，把他们争取教育过来的有效办法。（三）专政机关的一套旧的办案作风和办案路线，必须大破，非改不可。

〔2〕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在中联部一个请示报告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七月）

删去了几个字。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马来亚革命者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要求在中国公开发表《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马来西亚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一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为此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日给中央、中央文革写请示报告，认为“我们不便发表”。报告中两次提到马共内部的路线分歧问题，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得到党内解决。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两处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并写了这个批语。

对解放军报社《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等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林彪[1]同志阅后，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一阅。然后退还解放军报总编小组。此件[2]可以试行，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修改计划。人民日报也要试作计划。而要有一个像样的计划，就非征求若干基本读者的意见不能成功。

毛　泽　东

八月五日下午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指解放军报社临时总编小组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送毛泽东审阅的《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七条：（一）突出宣传军队帮助革委会的巩固和发展；（二）大力宣传全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抓好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三）深入宣传毛主席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四）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五）加强对革命大批判的宣传；（六）紧密结合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宣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

公报发表两周年，以及大办民兵师题词十周年；（七）加强言论，写好社论等文章。与这份宣传要点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报社临时总编小组八月一日《征求对报纸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的意见座谈会的情况简报》。简报说，最近我们邀请了十个单位的十四位同志到报社座谈，征求他们对报社最近一个时期宣传要点的意见。今后每三个月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把《解放军报》办得更好。

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1]的安排意见的批语[2]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一）完全同意。（二）郑维山[3]应参加领导小组。（三）领导小组要经常开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毛　泽　东

八月五日下午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毛泽东最新指示，指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接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时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谈话要点。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

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中央两个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的布告（即广西布告，见本册第502页注〔1〕）和七月二十四日的布告（即陕西布告，见本册第510页注〔1〕）。

〔2〕 这个批语写在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周恩来对这个报告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报告指出，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工作中，军队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对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参照广西等地的经验，我们对下一步的工作拟作如下安排：一、北京驻军、北京卫戍区已组织几万人至十万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大学、工厂、街道、农村等处，发动群众，宣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二、宣传工作要点面结合，重点抓好大学和几个问题多、影响大的工厂、机关、招待所。三、抓好典型。四、发动三军采取适当形式大力支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五、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六、这次群众运动要与准备国庆节的治安工作结合起来，持续保证首都安全和革命秩序。

〔3〕 郑维山，当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对解放军报社两个座谈会情况简报[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

一

这两个座谈会所提出的意见，有很多都值得注意，应当采纳。他们的意见，无非是说，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毛　泽　东

八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如恢复，此四字宜重写。[2]

三

官僚主义问题。[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解放军报社总编室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编印的《军报生活》第二九二期上登载的《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和《海边防指战员对办好报纸的希望》两份简报，分别介绍了解放军报社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邀请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就今后怎样把《解放军报》办得更好的问题举行座谈会，和八月二日邀请西藏军区、福州军区及海军一些同志，就同一主题举行座谈会的情况。

〔2〕《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中，有一条讲到："希望很快恢复'思想战线'。"在"思想战线"四个字下面，毛泽东划了杠，并写了这个批语。"思想战线"是《解放军报》原来开辟的一个栏目，后来停办了。"思想战线"四个字是由毛泽东题写的。

〔3〕《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中有两条讲到："记者到'三支''两军'前线去得少"，"到《解放军报》找人很困难"。在这两条下面，毛泽东都划了杠，并写了这个批语。

关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段话

（一九六八年）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1〕

根据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社论还写道："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极其重要，对于我们完成面临的各项任务有重大的意义。"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姚文元将这篇社论稿送毛泽东审阅时，曾在毛泽东的这段话旁注明："这段引文第一次见报。"毛泽东审阅时，对这段话作了一点文字的修改，并批示："照发。"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

这个材料〔1〕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

毛　泽　东

八月十六日

根据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指上海市革委会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在宣传、学习、贯彻和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收缴武器，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的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一）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对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二）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起来促头头。（三）对“老大难”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要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妥善处理。（四）注意发扬“老大难”单位中的先进因素，促使其改变落后面貌。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1]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八年八月）

一

照发。

略有修改。[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本报七月二十二日编者按[3]中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大学生，而不是指那些重视工农、愿意向工农学习的大多数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这篇社论稿是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而写的，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送毛泽东审阅，八月十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　见本篇二。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外，他还将文中“挑动工农斗学生”改为“挑动群众斗群众”。

〔3〕　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所加的编者按。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一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工人为主体的、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认真搞好斗、批、改，就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的创举。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这篇社论稿是为祝贺福建省革委会的成立而写的，原题为《团结对敌》，毛泽东审阅时改为现在的题目。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在八月二十一日发表。

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八月）

一

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2]。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

毛　泽　东

八月廿二日下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3]

三

大体可以了。

四

除已写明是我讲的两段话以外，其余都不用粗体。〔4〕

五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六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

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七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九

这个“独立王国”〔5〕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十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

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十一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十二

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

“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十三

在这个过程〔6〕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十四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

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十五

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7〕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

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本篇一、二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姚文元八月二十三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五是对姚文元八月二十四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六至十五是对这三次送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将这篇文章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根据您'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写了一篇评论，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文中整理的毛泽东的两段讲话，毛泽东审阅时又作了一些修改，见本篇十一、十四中带引号的文字。这篇文章送审时，原题为《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从此以后作为毛泽东语录引用），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发表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人民日报》等报纸在八月二十六日转载。

〔3〕 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送审稿中写道："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写了这个批语。

〔4〕 姚文元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送审稿上写有："这是准备提交碰头会宣读的稿子。您加的一些段落，都用了粗体，以便同志们了解学习。如认为有的地方在发表时不宜用，请注明。"毛

泽东在“不宜用”三字下划了一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批语中所指的两段话，见本篇十一、十四中的两段引文。

〔5〕 指上文中提到的所谓“旧北京市委”的“独立王国”。

〔6〕 指上文中提到的“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促进那里的斗、批、改”的过程。

〔7〕 引号中的文字公开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八月）

此文可用。但从 13 页起的两节中读起来较沉闷，空话太多，新意太少，宜加删改。并宜接触当前政治斗争。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送审的这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共分五节。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第四节中以下一段话："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整个世界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通过各种新闻手段向全世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播毛主席的伟大声音，这是我们对战斗的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支援。"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和九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毛泽东批语中说的

“从 13 页起的两节”，指这篇文章的第四、五两节，发表前作了一些删改。

对电讯稿《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

康生、文元〔1〕同志：

二七工厂材料〔2〕，请你们研究一下。加上北京别的工厂的材料一起，看是否可以写成一个整党文件，以便督促各地执行。

毛　泽　东

八月廿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不吸引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支部成员原班人马太多，看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3〕

三

既然车间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了核心作用，又要支部加强领导，岂不矛盾？〔4〕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文元，即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2〕　指题为《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的新华社电讯稿，载于新华社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文化革命动向》第一三八三期。这篇电讯稿说，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现有两个厂革委会，两套领导班子。一套是去年十月成立的老革委会和各车间的革委会，受原来的"红造团"成员拥护；另一套是今年六月二十日重新成立的新革委会和各车间的党支部，受由大多数党、团员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拥护。由于工厂两派分歧的加深，现在两个革委会都处于瘫痪状态。

〔3〕　新华社的这篇电讯稿说，据"红造团"反映，二七机车厂在整党过程中，没有充分开展大批判，也没有充分吸收群众意见和发展造反派群众入党，就匆匆忙忙恢复了党组织。恢复后的党支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前原班人马。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二七厂的整党建党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缺点是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就选举了支部委员会。毛泽东在这两段话旁边划了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4〕　新华社的这篇电讯稿说，二七机车厂军管会认为，"各车

间的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到核心作用，所以只能让党支部来加强领导。结果形成了两个中心”。在这段话下面，毛泽东划了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对派工宣队进学校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周恩来等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前遵主席指示，由姚文元同志起草了这个通知，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一些修改。""请主席予以批示。"本篇一写在周恩来等的报告上。本篇二是对周恩来等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周恩来等送审的通知稿写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进校前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了这个通知。

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

此件〔1〕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

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八年九月　日

二

拟发表的材料一篇及按语，送林、周〔2〕及文革各同志阅，退姚文元〔3〕同志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并请总理提向碰头会上一议，加以修改。建议在红旗第三期上发表。

毛　泽　东

八月卅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送审的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这篇调查报告说，最近，我们调查了上海工业战线工人技术人员的情况，发现有一大批工人技术人员分布在上海大、中、小工厂中，其中在数量众多的小型厂中，工人技术人员要占本单位技术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他们和广大工人是发展科学技术的主力军。这支强大的工人技术人员队伍，将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力量，也是理工科大学师资队伍的主要来源。学校要进行教育革命，必须改造现有的师资队伍。上海这支工人技术人员队伍，有很高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有丰富的三大革命运动经验，懂得怎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此，完全可以从他们中间选拔一批优秀者来担任大学教员。最近进大学的工宣队中，就有一批工人技术人员。可以肯定，随着学校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工人阶级在教育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将愈益显著。毛泽东审阅时，将调查报告讲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句中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删去；将由工人技术人员来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为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一句中的"人类历史上"五个字删去。这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编者按，后来都没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2〕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3〕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关于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驻军队院校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八月）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上。报告建议，对目前还"没有成立革委会，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长期打'内战'，存有不少严重问题"的五十三所军队院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除派领导干部及一般干部参加外，拟从部队抽调一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部分五好战士参加，组织强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并在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

对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八月）

一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辽宁省营口县水源公社各学校的教育革命，搞得比较出色。他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学校的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结合，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开展一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这篇《人民日报》批判组的调查报告载于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五九三期。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将这篇调查报告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不错，有一些很

好的经验，特别在贫下中农掌权和教育体制革命两个方面。可否登下一期《红旗》并加按语。”毛泽东审阅时，将调查报告的副标题改为《记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一；本篇二是对调查报告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改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越南人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坚持人民战争，同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作

出了贡献。

美帝国主义霸占越南南方、分割越南民族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在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的同时，大搞和谈阴谋。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中配合，力图使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早已成为美帝侵略越南的头号帮凶。

但是，美帝、苏修加在一起，也挽救不了美国侵略者在越南必然失败的命运。它们互相勾结、重新瓜分世界的狂妄企图，正在遭到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美帝、苏修越是勾结在一起，世界人民就越看清楚他们是一丘之貉。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大好。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曲折，但是，我们深信，久经战争考验的三千一百万越南人民，只要发扬彻底革命精神，坚持持久战争，必将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七亿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1]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一

红旗杂志编者按：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

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二

姚文元〔2〕同志：

此件仍有用，可发表。我写的这个按语，是否妥当，请提到碰头会一议。

毛　泽　东

九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上海市革委会继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报送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见本册第544页注〔1〕）之后，又报送的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说，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创办时，第一届招收的二千余名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选拔的。这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的学生，学习目的性明确，阶级觉悟高，学以致用，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和广大师生，在总结建校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一、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哪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

题。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至三年为宜。三、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中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均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

〔2〕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建议普遍开拥军谈心会

（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

建议将此件[1]通报全军，普遍开谈心会。

毛　泽　东

九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整理的一份信访摘报。摘报说，最近云南个旧、河北保定、四川内江、福建福安和厦门等地的群众组织来信反映，他们在八一前邀请当地驻军开拥军“谈心会”或座谈会，会上群众组织的代表称赞了部队的功绩，主动检查了对待部队的一些错误态度。部队同志则“主动检查了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缺点和一些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诚恳地向群众赔礼道歉”。通过拥军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一九六八年十月四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这个信访摘报转发全军，要求凡担任“三支”、“两军”的部队，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普遍开谈心会，对持不同观点的群众诚恳对待，多作自我批评，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

对北京市召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

林、周[1]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2]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2〕 指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已于八月二十九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三十一日，我们召集这些学校的宣传队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

事务主义。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要实行统一领导，对重要问题表态必须经过集体讨论。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革中的功与过；要与学生同吃、同住，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而最好的办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好学习班。三、在革命大联合问题上，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基础上，按班系、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确是坏人的，要实行群众专政；对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篇社论稿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庆贺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而写的，经毛泽东审阅后，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发表。

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九月）

一

照发。

二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2]

三

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3〕

四

整个教育制度〔4〕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将这份调查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上海送来了几份调查报告。我看了之后，觉得这份较好。教育、文艺之外，卫生系统的革命也是一大问题。可否登下期《红旗》？"本篇一写在姚文元送审的调查报告上。本篇二至四是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加写的话。此外，他还将调查报告的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人民日报》九月十四日予以转载。

〔2〕　调查报告中写道：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段话。

〔3〕 调查报告中写道：另一位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句话。

〔4〕 调查报告在对江镇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进行对比后指出：“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在其中的“旧医学教育制度”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几个字。

对《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1]一文的修改和批语[2]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

一

建立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同时，还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二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是为配合发

表毛泽东撰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见本册第550—551页）而写的，原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审阅时改为现在的标题，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二是他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目录页上的批语。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写道：“送上第三期《红旗》杂志见报目录，请审批。评论员文章如不适用，请勾去。‘赤脚医生’一文中有一段主席重要文字，拟用粗体，附上一并请批。”评论员文章，即《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赤脚医生”一文，即《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都发表在《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对姚文元关于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调查会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

一

林、周[2]及文革各同志阅。他要回电，请用文革名义给他去一个电话，说十五日信已收到，同意他们的意见。

毛　泽　东

九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可以吧。——毛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上海市革委会

副主任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今天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同我到了国棉十七厂，开整党建党问题调查会。这个厂是上海一个重要的革命阵地，领导成分已有很大更新。过去七个党委委员，有四个被打倒，两个被结合，一个靠边站。现在的革委会十三个常委，有十个是党员，其中七人是从一般党员中起来造走资派的反，经过运动考验，被群众选入革委会的。因为领导核心经过补充新鲜血液，他们找的发展对象就较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要求入党的新党员由什么人批准?春桥同志和我都认为："像这样条件的单位，经过市革委会同意，革委会中的党组织（即十三个常委中的十个党员）可以执行党委或临时党委的职能，有权批准新党员入党。不知可否这样试验一下，请予指示。"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

〔2〕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毛泽东等对霍查、谢胡电贺我国二十九个省、市、区成立革委会的复电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我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你们热情洋溢的贺电，这是对正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中国人民的巨大鼓舞和巨大支持。我们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大的敬意。

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正在开展一场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意义的革命化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今年，恩维尔·霍

查同志提出的教育革命和工人阶级监督，丰富了这个运动的内容，推动了这个运动的发展。我们最热烈地祝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取得越来越辉煌的胜利。这一胜利使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发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前几天，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庄严地宣布退出华沙条约〔1〕的决定和法令。这是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又一沉重打击，是对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叛徒集团斗争的巨大鼓舞。华沙条约早已成为赫鲁晓夫〔2〕修正主义集团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控制和掠夺东欧各国人民的工具，早已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用来同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作交易、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工具。最近，苏修叛徒集团纠集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修正主义伙伴，公然利用华沙条约的名义，武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这个条约的侵略性和反动性。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集团，对侵略者采取了卖国投降的政策，可耻地背叛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其杰出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对苏修叛徒集团利用华沙条约从事的种种罪恶活动，久已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十分钦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这一斗争中所表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原则性。

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兄弟的阿尔巴

尼亚人民退出华沙条约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控制的华沙条约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西欧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其他侵略性条约组织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受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奴役和威胁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阿两国人民在革命的暴风雨中建立起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友谊，是经受得住严峻考验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得更加坚强的七亿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将始终如一地站在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边。如果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走狗胆敢动阿尔巴尼亚一根毫毛，等着他们的只能是彻底的、可耻的、无可挽回的失败。

亲爱的同志们，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在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紧随美帝、苏修的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携手前进吧！

伟大的、牢不可破的中阿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华沙条约，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八国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在华沙签订的条约，同年六月四日起生效，有效期二十年。条约宣称将致力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条约生效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以华沙条约组织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同年九月，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2〕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3〕 北大西洋公约，指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加拿大、冰岛、意大利、葡萄牙十二国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在华盛顿签订的条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起生效。希腊、土耳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来相继加入。一九四九年八月，根据公约规定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权力机构为部长理事会，最高军事机构为防务计划委员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设有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部等，还设有核防御军务委员会和核计划小组等辅助机构。

对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

请林彪同志先看，我再看，然后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委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100多人就够了。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周恩来和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中汇报了九月十五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其中讲到，这次全会的议程之一是推选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九大”前作为党和国家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参加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人数，连同能出席全会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在内，约三百人左右。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举行。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林、周〔1〕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2〕请碰头会议复。

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量办理。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2〕 指上海市革委会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经过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有条件并有必要在造反派中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增加新鲜血液。根据毛主席关于"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的指示，我们决定首先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吸收入党的人，必须是认真学习和执行毛泽东思想的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必须具备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能够同革命群众一起向党内外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必须坚持

斗私批修，进行自我批评，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断改造自己。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望各地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整党及发展新党员的有关指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办理，并作出适当的规划，上报中央。"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工宣队进入中小学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此件〔1〕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2〕及文革各同志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上海市革委会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工宣队进入中小学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九月五日至十二日，我们组织了三万一千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十个区的五百一十三所中学和一千二百四十九所小学。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全市中小学于九月十六日开学，广大师生纷纷到校。开学后，各校都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宣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原来革命大联合不巩固的学校、班级，有些也联合起来了。对一些复课闹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工宣队则注意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此外，工宣队还做了大量的整顿校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工作。目前，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正在组织工宣队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同时深入调查研

究，为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作准备，摸索经验，树立典型，逐步推广。一九六八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2〕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月）

姚文元〔1〕同志：

此件〔2〕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毛　泽　东

九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载于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

二

可用。〔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2〕　指《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

文，载于《人民日报》总编室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六二八期。文章说，今年五月七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一百四十一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三千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批语的主要内容。

〔3〕 这个批语写在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送审的《人民日报》为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而写的编者按语稿上。按语稿中说，毛泽东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勃勃的革命的青春。”

对召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队员大会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

太多。

十人中选一人似较好。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周恩来等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写报告说：我们看了些材料，觉得似有必要召开一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大会，“向他们打招呼，说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主要是说一下学校中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经历，红卫兵小将所起过的主流作用，他们有过些什么错误、缺点”。“请主席考虑，开这样的大会，是否必要，是否及时”。报告还附注北京现有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共三万七千九百二十三人，拟在四个人中抽一人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的批语是对此而写的。

对林彪在国庆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

一

在第二页末段去掉一句。

二

这一句不要。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周恩来等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送审的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第二页末段说到："全国成千成万的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或者正在开进大、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

审阅时，删去了末尾一句“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并写了两条批语，即本篇一、二。十月一日，林彪根据这个讲话稿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上讲话。讲话在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篇社论稿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而写的。其中讲到，工人阶级派出宣传队，直接进入学校，进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领导那里的斗、批、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这篇社论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讲的两段话[1]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一

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

二

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

根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讲话中的两段话，林彪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作了引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

可以发了。目录中有改变〔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送审的社论稿上。社论稿的副标题为《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写道："第十页上，我增加了一段您的最新指示，这是对当前运动有深刻指导意义的。现送上，请审阅。"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见本册第581页之二。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

〔2〕　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目录上，《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文排在第四篇，毛泽东审阅时，将它改作第一篇。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一九六八年）

一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1〕

二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2〕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刊印。

注 释

〔1〕 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

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这句话用黑体字排印。

〔2〕《红旗》杂志这篇社论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社论；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段话。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等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

一

印发十二中全会[2]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有一点修改[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已印发，让大家讨论为宜。

毛　泽　东

十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有一些修改[4]，待议。

四

在第四页上作了一点修改〔5〕，因为托洛茨基和瞿秋白也谈不断革命〔6〕。

五

已阅。退康生同志。

六

在第七页上增加了三个字。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七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7〕，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主席指示和各地各单位的意见，我们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两次，我们又作了多次修改。中央文革碰头会各同志建

议先送主席看看，是否基本可用？请主席审查、修改、批示。”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写在康生等十月十二日送审的党章草案上的批语；本篇三是写在周恩来等十月二十六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稿上的批语；本篇四是写在周恩来等十一月二日送审的这个决定稿上的批语；本篇五是写在周恩来等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送审的党章草案上的批语；本篇六是写在康生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送审的党章草案上的批语；本篇七是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日、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送审的党章草案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四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 指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3〕 毛泽东对康生等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日送审的党章草案的修改，除本篇七外，还删去了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两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4〕 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稿的修改，主要是将决定稿中的“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毛主席指示”改为“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对同时送审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毛泽东也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删去了“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一句中的“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删去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句；再

次删去了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此外，还在“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中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5〕 指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修改。草案写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只能靠不断革命来解决”，毛泽东审阅时改为“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十一月三日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一起印发全党。

〔6〕 托洛茨基，原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〇五年提出“不断革命论”，主张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7〕 这句话原为：“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

祝贺霍查六十寿辰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敬爱的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您六十寿辰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衷心的、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您是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缔造者，是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阿尔巴尼亚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和您的正确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阿尔巴尼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您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深入地持续地开展革命化运动，同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您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恩维尔·霍查同志，您的光荣的历史证明，您真不愧

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勇战士。

中阿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是经过激烈的国际阶级斗争考验的。这种友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让我们两党、两国人民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各国革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彻底埋葬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苏修而并肩战斗！

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取得新的胜利和新的成就。祝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祝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健康长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发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调查报告[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月）

照办。〔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黑龙江省黑河地区革委会、爱辉县革委会、爱辉公社革委会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写的调查报告《从三个大队教育革命的实践看贫下中农怎样管理学校》。报告说，爱辉公社拉腰子、松树沟、外三道沟三个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于去年十一月开进了学校，一举夺回了农村教育大权，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他们管理学校的做法是：一、高举一面旗帜——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坚持一条道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三、建立一支队伍——整顿、改造、重建了农村教师队伍；四、实行一元化的普及教育——为贫下中农子女入学大开方便之门；五、组成一个班子——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2〕 这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送审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报告中说：“黑龙江送来两篇材料，挑选了这一篇，我觉得内容、写法都较好 。

准备再过三四天在《人民日报》用。”《人民日报》为发表这篇调查报告写的编者按指出：“这篇报告写得很生动，有对比，有材料，有总结，使人们对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毒害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好处，有一个具体的认识。贫下中农说：现在‘学校是咱们的学校’了，这不是对教育革命最大的赞美吗？”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发表在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对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月）

一

印发全会各同志讨论。

二

此句此地不用为宜。[2]

三

有一点修改。[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二写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稿上；本篇三写在十月三十日送审的公报稿上。这个公报十月三十一日经全会通过，十一月二日在《人民日

报》发表。

〔2〕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送审的公报稿中写道："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一句，并写了这个批语。此外，公报稿的这一段中还讲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唯一指导思想"，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唯一"二字。

〔3〕 毛泽东对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送审稿的修改，主要是删去了以下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大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

论述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一段话

（一九六八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中，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这个公报十一月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意见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1〕

根据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的一句话，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九年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中加以引用。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1〕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的一段话，《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用黑体字引用，载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和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对军委办事组转报的一份情况简报[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向毛泽东等转报的这份情况简报，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五连在某地“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和部队领导机关认真查证的情况。一九七二年五、六月份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曾将此件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在反映慕中岳编著中国历代战史的《要信摘报》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

送黄永胜〔2〕同志酌办。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如可能，可找来看看。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四〇八号上。摘报说，武汉市参事室研究员慕中岳（原国民党政府军少将，起义于川西）致毛主席一信称："他做了不少危害人民的罪行。为了对党立功赎罪，从一九五七年起研究中国历代战史，到一九六六年八月止，把东周晋楚

城濮战役，到北宋对西夏作战镇戎战役，其间每个朝代的主要战役写成了初稿。共三十一卷，二百七十万余字。”还说，“战役初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小将搬走。现将自己所记忆的每卷情况制成表和汇编成‘中国历代战史’编著情况简介，向主席汇报”。毛泽东阅看时，在这句话旁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2〕 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四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你们英雄的国家解放二十四周年光辉节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伟大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四年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发扬了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的伟大胜利。

近几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持续地开展了群众性的革命化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一个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阶段。这个运动，大大地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的革命，加速了生产的发展，加强了国防，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旗，坚决支持世界革命，坚持不懈地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苏修叛徒集团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你们无情地揭露了苏修的侵略面目和美苏勾结的罪恶阴谋，毅然地宣布退出苏修一手控制的、已经变为侵略性的、反社会主义的华沙条约〔1〕。这一革命行动，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和东欧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苏修叛徒集团。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放射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辉，已经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堡垒。中国人民对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的英雄气概表示无限的钦佩，热烈地祝贺你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亲爱的战友们！世界革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世界人民革命运动正在风起云涌，向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发动猛烈的进攻。美帝和苏修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我们坚信，中阿两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切被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必将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必将推翻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胜利是一定属于全世界革命人民的。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两国政府、两国军队的伟大战斗友谊，是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经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我们再次向你们表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七亿中国人民，誓作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坚强后盾，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的反帝反修斗争。让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两国政府、两国军队在反对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共同斗争中，互相鼓舞，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携手前进！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华沙条约，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八国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在华沙签订的条约，同年六月四日起生效，有效期二十年。条约宣称将致力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条约生效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以华沙条约组织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同年九月，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同意转发北京军区贯彻执行“要节约闹革命”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可转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党委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的这个报告中说，我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节约运动，使部队进一步锤炼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发挥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勤俭节约取得了新成绩。其中今年全军区共冻结、压缩、削减经费七千三百多万元，去冬今春节约取暖用煤九万多吨，高速度、高质量地兴建了一批中小工业。十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将这个报告送毛泽东等审阅时写道：“军委办事组讨论，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拟转发全军。”毛泽东在这下面划了杠，并写了这个批语。

对《人民日报》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等文章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

此件照办。

另外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起来办的问题，也应提出讨论。[2]上海和北京都有些可供发表的材料。吴研因的信[3]似也可发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篇报道，经核实后，又拿到北京郊区开了两次座谈会，也整理了一个材料。“可否过两天将按语、报道及座谈会情况（摘要）同时见报，展开讨论，请批示”。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姚文元的这个报告上。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湖北省宜昌地区革委会、长阳县革委会、长阳县人民武装部调查组《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文和《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

会纪要》。

〔2〕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群众来信。次日，即开辟了《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专栏。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专栏第七期起，增加了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内容，开始涉及可否划归工厂和街道联办的问题。这个讨论专栏后来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八月，共一九七期。

〔3〕 指著名教育家吴研因题为《我对“建议”的看法》的来信。信中说，读了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来信，觉得很好，能够大大加速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我认为，大中城市的城区小学，也可以下放给工厂办，好处和大队办学差不多。这封信发表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人民日报》。

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

一

林、周〔1〕及文革各同志：

建议将此件〔2〕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　泽　东

十二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这个厂〔3〕有三千工人，连家属共一万人。

三

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毛注〔4〕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驻北京新华印刷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新华社记者关于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报告说，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对全厂已揪出的六十八名阶级敌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反复调查，反复研究，反复核实的基础上，根据阶级敌人罪恶的轻重，坦白交代的好坏和悔过自新的表现，做出恰如其分的定案处理，给予他们不同的出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委会将这个报告报送毛泽东等。本篇一是毛泽东写在北京市革委会送审报告上的批语；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在新华印刷厂经验报告中加写的两条注。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发给各地参考。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揪出所谓“六十八名阶级敌人”问题，中共中央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批准的北京市委、国家出版局关于为北京新华印刷厂问题彻底平反的报告指出，“四人帮”一九六八年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炮制的那个假经验文件（见本册第495页注〔1〕），应予否定；强加给该厂广大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所

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应予平反昭雪。

〔3〕 指北京新华印刷厂。

〔4〕《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中讲到，这个厂有一位党委副书记，过去在运动中被当成走资派来批斗，“后来经过反复核实，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而这个人出身很苦，旧社会曾经要过饭，大家认为他本质上还是好的。经过群众的冲击之后，他对自己的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学习改造过程中表现还好，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在各连队派代表参加的会上，他进行了检查，绝大多数同意解放他。革委会准备还在全厂范围内让他做检查”。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注。

在中央军委一份复电稿上的批注[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请注意以后不要写这类语句。——毛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关于同意核实验中使用飞机给国防科委并空军的复电稿的末尾，写有“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口号，并写了这个注。

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调查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建议将此件〔1〕转发各地参考。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指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为做好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准备，军区各部队组织一千一百多个调查组下去调查。从已调查完的三十四个县的三千五百九十八个社、队领导班子情况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二类是中间状态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这类班子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三类是不好的，大体上占百分之十三至十五，这类班子严重不纯，基本上是坏人掌权。调查情况表明，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重点。支农部队应根据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了这个报告。

对国防科委关于发射“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王秉璋等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七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写报告说，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一九六八年四月批准的“东风三号”地地导弹试验计划，应继续用两发试验弹进行全射程飞行试验。绝大多数工人和技术人员确信可以保证总装质量，要求尽快进行飞行试验，向“九大”献礼。特此报告，请批示。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中央军委办事组十二月十二日转送的送审报告上。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阮友寿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站在反美斗争最前线的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八年来，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发扬了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人民战争，消灭了美伪军和仆从军大量有生力量，把美国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越南南方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最后击败美帝国主义，实现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统一祖国的伟大目标，打下了基础，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实践又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人民战争面前，是经不起打的，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它在越南的失败，正在大肆玩弄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进行垂死的挣扎。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帮助美帝扑灭越南人民的革命烈火，正在加紧同美帝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但是，美帝、苏修的一切阴谋诡计，在久经考验的越南人民面前，是不会得逞的。

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我们相信，三千一百万英雄的越南人民，在其伟大领袖胡志明〔1〕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人民战争，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把美国侵略者赶出越南国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七亿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对《人民日报》转发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1]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可发。〔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甘肃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部分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目前全县已有一百七十八户、九百三十二人分别到十三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这个报道。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上。姚文元在报告中写道："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以执行'来一个动员'。"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见本册第616页。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

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甘肃日报》的报道中原有一段话讲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的“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人民日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为转载《甘肃日报》一篇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而发表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一

有一点修改，付讨论。

二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三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

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送审的通知稿上。通知稿第二条写道：“在提到敌人的名称时，应遵照中央历来文件中所明确规定的用语，如：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句话，即本篇二。通知稿第四条中写道：“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犯错误的人的子女，也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的大多数人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使其中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者孤立起来。”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三。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了这个通知。

关于徐州两派群众组织要大联合的意见[1]

（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

一

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

二

徐州已经翻了几个个了，再也不能翻个了。

三

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

四

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根据中共中央转发的文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间针对江苏徐海地区革命大联合迟迟不能实现的情况连续作出的四条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八军党委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关于改组徐州市革委会的请示报告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四条指示。这个报告后作为六十八军党委《关于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附件《关于改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送毛泽东等审阅。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六十八军党委《关于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附件。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批语稿时曾批示：“照办”。